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革命

【编者的话】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成立，并将于 2013 年秋季正式开班授课。这是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的第一个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备受诟病的今天，人们好奇，新生的上海纽约大学，是教育资源全球分配吹来中国的一阵清风，还是又走了过往合作办学价格高昂却质量参差的老路？与此



同时，近年来网络上火爆的公开课，流行世界各地的 TED 演讲，以及琳琅满目的在线课程，这些趋势都在提出一个新问题：“在高等教育资源全球再分配的信息时代，高等教育该怎么做？”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及其对我们的影响。

记者刘俊在《“中美混血”大学诞生记》一文当中，描画了多方努力之下，上海纽约大学诞生的起承转合，以及它所寄托着的人们的改革理想。上海纽约大学，将完全照搬美国最大私立大学纽约大学的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校长俞立中期盼着这所新的学校能为中国现代大学摸索出一条改革路径。例如如何去行政化，如何教学科研两不误，如何筹集社会资金，如何教授治校，如何学术自治……”学者熊丙奇的《上海纽约大学不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则通过阐释“合作办学”与“分校”这个常见概念误区，解读上海纽约大学的创立。并认为，应该在合作办学的基础上加大开放力度，才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的提升。

回到民间，主动获取先进教育资源的中国青年人，广泛活跃在各大网站和社交媒体。记者潘晓凌的《大学“DIY”教育 2.0 时代》就描绘了这样的社会创新光谱，她认为，“我的教育，我选择，我做主”是青年人在互联网时代的选择。纽约时报的《大学的墙要倒了》一文介绍了近年来各个大学推出多种网络免费课程并提供学位证书的新实践。

随着大学课程的网络化和开放化，很多人都猜想，或许未来的大学可以全程网络化，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全球化分配。然而，网络课程与公开课真的可以替代传统的教学方式吗？旅美学者吴澧认为，网络课程并不能取代美国大学的课堂教学，但或许会将指定的课前阅读材料，更多地转为网络视听内容，包括网络课程。不过，对那些习惯满堂灌的教授，还有普遍如此上课的大学，网络课程确实是威胁。如果同样是满堂灌，为什么要去教室？完全可以躺在沙发上，观看顶级教授的网上高水准表演，笔记则让语音识别软件自动代劳。钱理群教授通过《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叙写了感人的师生关系，本质意义上的教师”概念的提出，将教师与人类文明的传承紧密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特殊的知识阶层”，提出了高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同时也就树立起了一个高标尺。其实这本是不可退让的底线，但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下，就是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梦话。

无论如何，新一轮教育资源的全球化再分配，以及网络时代的无国界教育，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吴华的《“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

总结了近年来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 D. Bruce Johnstone 在《世界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中总结了一个外国大学校长对中国大学改革的认识。他认为，“大学变革”，不单是指大学本身的变化，而是指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的变化。而如果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讲授新的课程、或与学生和社区建立了新的关系、或从事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如果学生有了新的选择、或承担了新的责任、或改变了学习方法；如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有权力做出新的决定、或者按一套新的规则运作，并且这套新的规则会影响资助什么和不资助什么、解聘谁、奖励谁等方面的决定；那么大学才是真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状】

8-1 刘俊："中美混血"大学诞生记

"这所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大学取名上海纽约大学，将完全照搬美国最大私立大学纽约大学的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现在，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期盼着这所新的学校能为中国现代大学摸索出一条改革路径。例如如何去行政化，如何教学科研两不误，如何筹集社会资金，如何教授治校，如何学术自治……"

大约一百年前，美国人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而今，美国人又来了。

在外企扎堆的上海陆家嘴，两年后，一所中美合办大学将在这儿诞生，中国大学将迎来新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美混血儿。

这所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大学取名上海纽约大学，将完全照搬美国最大私立大学纽约大学的办学模式和评价体系。

现在，华东师大校长俞立中期盼着这所新的学校能为中国现代大学摸索出一条改革路径。例如如何去行政化，如何教学科研两不误，如何筹集社会资金，如何教授治校，如何学术自治……

两个校长的国际化野心

这并非华东师大和纽约大学的第一次联姻，早在 2006 年，纽大上海中心就已经联姻华东师大，这是一个类似于教学点一样的机构。

每年，纽大组织本部的学生到上海中心游学，华东师大的教授给他们上课。只要洋学生感兴趣，几乎什么课都开，甚至还有太极、书法，华东师大的学生也可以到上海中心上课，学分互换。

几年合作下来，纽大的学生有点“爱”上了华东师大。“他们第一批来中国的学生只有 18 个，去年直线上升到一两百人，这让他们很不可思议。”俞立中说。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John Sexton）现在已经跟俞立中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几乎每年他们都要见上一次面。看着势头喜人，赛克斯顿就跟俞立中商量干脆在上海办个分校。

这个提议得到了俞的热烈回应，因为这两个校长都有一样的改革共识：国际化。

62 岁的俞立中，科学家出身，下过乡，留过洋，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一代，2006 年开始掌舵华东师大的时候，担子不轻。“华东师大不能跟排在我们前面的学校屁股后面走，要走自己的路。”他说。“拼 SCI 论文我们拼不过复旦交大清华，人家 SCI 论文多，说明学校里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人多了，而培养创新人才，除了学科交叉，很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国际化。”

俞立中要求下属们做什么事都得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平台上考虑问题，现在见到国外大学校长，俞立中给他们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从来不用华东师大多少 SCI 论文、有多少科研经费这些国内的话语体系，“而是告诉他们，我们的人才培养希望怎样去做”。

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比俞立中略长几岁，爱尔兰移民，法学背景，在美国最高法院奋斗了好多年，跟俞立中一样，建立一个全球化的教学网络来抗衡常春藤名校，亦是赛克斯顿 2001 年担任纽约大学校长后力推的改革，此前纽约大学已经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学点。

然而美国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并不容易，俞立中一头扎进了资料堆里，研究怎么在现有体制下，突破以往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幸运的是，他们还没上报教育部，转机就在 2009 年提前出现了。当时，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到纽大访问，赛克斯顿向大使表达了跟华东师大合作办校的想法，驻美大使就给教育部发了传真。

教育部立即来函要求华东师大讲清来龙去脉。俞说，教育部的态度相当积极，态度也很明确，不是不能突破，关键是告诉他们华东师大的真正意图。“对中国来讲，多一所大学已经没什么意义，我们做的是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事情，是如何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推动我们自身大学的变革。”

一些大学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跑到教育部谈主要是为了争取一年多给多少招生指标，因为学生招得越多，成本就可以摊下去。但俞立中却问教育部长袁贵仁，能不能少招点学生。俞回忆，袁当时对他说：“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你们真想做点事情。”

即便获得教育部领导肯定，但毕竟是新生事物，在 2010 年 7 月华东师大正式递交申请报告之前，他跟教育部磨合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反反复复地讨论，主要是模式方面的问题。”俞说，申报之后，教育部特地派了个由一些大学校长组成的专家组到华东师大调研，听取华东师大管理层汇报。

但最终能获得准生证，其实靠的不仅只有华东师大自己。

“上海的领导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北京沟通。”俞立中说，“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特区，怎样开辟一个试点，尤其是高等教育新的办学模式，一直是上海感兴趣的事。”在上海市教委 2011 年工作重点中，积极筹设“上海纽约大学”亦被纳入其中。

而最终落户陆家嘴则是纽约大学的主意。设在曼哈顿岛上的纽约大学是美国典型的都市型大学，赛克斯顿希望把这种文化带到上海。浦东区政府听闻之后也非常积极，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引擎的浦东，希望高等教育带来新的支撑，未来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地、校舍建筑将由浦东政府提供支持。

这将是一所怎样的大学？

虽然离它呱呱坠地还有个一年半载，但已经有好些高中生家长在私下跟俞立中打听，“什么样的孩子有资格进来？”

未来上海纽大，几乎跟进曼哈顿的纽大没什么区别。专业都是金融、数学、经济学等这些纽约大学在全美排名前列的几个学科，学生还可以到纽约大学总部游学一两个学期，学分通用，最后将拿到上海纽大的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如果没一个公认的标准，别人会认为只要有钱都可以上。”俞立中说，哪怕招不满，也不会把不符合条件的人招进来。“我们做的是一次国际化的试验，是精英教育。”

按照最初的设计，上海纽约大学一年就招几百个学生，中国和海外的各一半，海外的就全按纽约大学的那套游戏规则招。而中国的学生要想踏进上海纽约大学的门槛，高考将是一把重要的尺子。

既然是精英式培养，老师们也得是精兵强将。师生比例完全参照纽约大学的 1∶8。“我们有些学校 1∶18 都不稀奇。”俞立中说。而全球挖人的工作全交给纽约大学一手操办。

这事，难不倒纽约大学校长赛克斯顿。在 2001 年担任校长之前，他是纽约大学法学院院长，上任十四年，他从哈佛、耶鲁挖了三十多个大腕教授，纽大法学院就从一个二流法学院，跻身为与耶鲁哈佛齐名的一流法学院。

老师来了，学生也来了，钱怎么办？

纽约大学一名本科生一年光学费就得 2. 8 万美金，合人民币近二十万。俞立中说，上海纽约大学会提供比较多的奖学金，把那些成绩好但不能到海外留学的普通家庭学生给吸引过来。

可中国的政府奖学金不多，在纽约大学阿联酋的分校，学生一分钱不用花，都是酋长一个人埋单。俞立中说，到时会想办法通过企业投资。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全靠国家投资，如何通过社会募款，俞立中亦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运作中找到答案。“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学校做得好的，但创办于 1831 年的私立大学纽约大学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

这事在纽大一般由董事会张罗，类似于中国的校长办公室，上边还有个理事会，属于学校最高机构，类似于中国大学里的党委。而未来的上海纽约大学理事会，将是美方四个人，中方四个人。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华东师大来提名，常务副校长由纽大提名。

这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在中国国土上搞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学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学术上面的问题，更多的根据纽约大学的惯例去做。”俞介绍说。

要借鉴的不仅如此。俞立中说，他们的初衷就是想借鉴上海纽约大学的经验，反思自己在教育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应该去改，从而推动母体学校的改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男星对此相当看好，“在原有的已经成形的体系里很难打破这些障碍，重新找一个新的壳，可能更容易实施，更容易看到成果。”

比如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在美国也一直难以调和。

2001 年开始，赛克斯顿决定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要求科研人员花更多的时间陪本科学生，教授不再以科研论英雄，给本科生上课多寡是决定这个科研人员职业声誉的重要标准。包括赛克斯顿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可能是美国惟一仍在给本科生上课的大学校长，去年，他教了四门课。

虽然纽约大学在中国的名气不如常春藤那些名校，但它连续多年超越哈佛耶鲁被评为全美高中生最愿意就读的大学。“它的人才培养更贴近社会，或者将来就业会更加好。”俞说。

俞立中已经跟赛克斯顿约定，日后上海纽约大学建成了，华东师大的管理人员将会直接到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挂职。“在学校管理方面，他们的一些做法，对反思我们自身的教学和我们大学的管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镜子。”俞说。

中外合办到底能带来什么？

对这个新生大学感兴趣的，不仅有学生家长，俞立中的同行们也充满了好奇。

有一次，上海交大党委书记碰到俞立中，问他：“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对你们华东师大有什么好处？”俞立中半开玩笑地说：“华东师大没你们名气响，我们要借助外力。”

虽是玩笑话，也是俞立中的真实想法。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有人说这个模式好，大家一窝蜂都去搞这个模式，结果把好的模式都带坏了。

“它的示范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的探索，但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潮流。”俞立中认为，每一所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模式，都应该有自己的烙印。

不过在中国，一个潮流之下，很难没有追随者。

过去十年，在扩招并校的指令之下，高校追求的是高大全，千校一面，学校个性不再。如今这条路各个高校都觉得不再灵光，那么在追求特色中，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为一个新招牌。

据上海《文汇报》报道，未来5年，上海紫竹国际教育园区也将启动建设，美国常春藤联盟名校及其他国际一流高校将加入其中，以合作办学的方式对外招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并不看好。“只有鼓励国外大学直接在国内建立分校，才能真正逼着国内高校改革。”熊丙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这些学校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真正促进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

之所以现在中国还不允许这么做，熊认为，恐怕是体制尚属脆弱，而且内地高校也还没有做好应对竞争的准备。

熊以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为例，香港高校在2005年可以在内地自主招生。当时被北大录取了，同样可以参加香港大学的自主招生，许多内地状元放弃北大清华到香港读书。但2007年之后政策开始倒退，内地学生不能同时获得内地和香港的录取通知书，保送生也不准参加香港高校的自主招生。

不过，在教育部系统工作的张男星却并不这么看，“目前不能建分校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未来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教育部允许华东师大试点本身就表明了它开放的姿态。”

实际上，上海纽约大学也是一连串高校自主办学模式改革创新的序曲。此前的 2010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试点地区，上海市亦在名单之列，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步骤，教育部希望借此“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

（赵一海对此文有贡献）

（刘俊，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55609）

【返回目录】

8-2 熊丙奇:上海纽约大学不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



“不少舆论把上海纽约大学称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这是对学校办学模式的误解。中外合作办学和分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日前，上海纽约大学宣布正式成立，计划于明年开始面向全球招生。而差不多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启动筹建。诸多迹象表明，我国内地正加大引进境外知名高校来内地合作办学的力度。

这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必然，该纲要明确指出，“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在笔者看来，我国高等教育要从高等教育大国，建设为高等教育强国，对外开放是重要途径之一，中外合作办学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尝试更为开放的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整体教育制度的局限，具体表现在政府管得太多，将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二是学校内部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编写、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方式方面落后，满足不了受教育者需要，也与社会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脱节。后一方面的问题又很大程度受制于前一方面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已经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项目）看，相关办学方都称可以通过合作办学，引进海外学校的师资、课程、教材和教学模式，提高办学质量，以此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客观而言，这些学校和项目，确实引进了海外先进的课程和教材，也多由外籍教师任教，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可是，其对我国内地教改的促进作用却有限，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前述的第一方面问题，即推进政府部门放权，促进内地高校自主竞争。

这和引进境外名校的模式有关，不少舆论把上海纽约大学称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这是对学校办学模式的误解。中外合作办学和分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那么，这所学校的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都应该采取和母体校一样的方式，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但中外合作则不同，学校的整体管理，是纳入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的，在招生时，考生不可能同时拿到上海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内地其他学校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在学位授予时，上海纽约大学授予的是国内统一承认为文凭而非学校自主授予、社会专业机构认证。

概而言之，引进海外名校合作办学，在我国内地，可为受教育者新增一所办学质量不错的学校——这所学校因为不菲的学费、有限的招生规模，对扩大内地学生的选择空间也有限，却难以直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有 2600 多所高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走过数量时代，步入质量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在解决质量问题而不再是数量问题，而只有突破现有教育管理制度的局限，才可能整体提高内地高等教育的质量。

因此，笔者期待我国引进海外知名高校，应在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探索分校模式，如果海外名校能直接到内地办分校，那么，我国内地马上就会收获完全按现代学校制度举办的大学，而且，由于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给内地其他高校带来强烈的冲击，促进高校间的竞争。

（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7db.html）

【返回目录】

【染】

8-3 潘晓凌：大学“DIY”教育 2. 0 时代



“‘大学’DIY（do it yourself，即‘自己动手做’）——字幕组热衷义务翻译国外有意思的公开课，转贴、浏览量最广的课程和演讲构建出一种创新的虚拟大学雏形；专注兴趣和好奇心的“分享主义者”线下聚会，头脑风暴，互相激发新思维。我的教育，我选择，我做主。”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哲学课？

“太不可思议了，地球上会存在这样一堂哲学课，”黄梓姣说，“这是所有人的集体感受。”“脑袋像被通了电源。”

在无美剧可追的夏天，“人人字幕组”发现了这些自 2004 年起美国常春藤大学就陆续上传校园官网的课堂视频，将授课内容翻译成中文字幕。“冒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哈佛大学桑德斯礼堂，桑德尔教授面对座无虚席的一千多名学生，当然也面对着摄像头之后不可估量的全球网民，说，“哲学教化着我们，也搅动着我们，它使我们和本已知的事物产生矛盾。这很讽刺。这堂课的难度在于，它在教你一些你已知道的事，它使我们一些本来毫无疑问熟悉的事物，一下子变得陌生。”

黄梓姣，广州某周刊记者，2010 年春节期间在开心网——媒体人扎堆的社交网站——就发现了这条课堂视频转帖，这条长达 54 分钟的非娱乐视频其时居然已被转贴数千次。此前，被转千次以上的视频长度基本在 5 分钟之内，以玩以闹为主。这是网络正在缩短思想集中度的事实，越短越好，否则就跳过。

这一次，黄梓姣却一口气把它看完。在桑德尔的正义第一课中，屏幕前的她似乎和地球另一端桑德斯礼堂里的一千多名学生被不断要求思考一个个道德困境——

A. 你开着一辆电轨车，突然刹车失灵，车前方有五个工人，分岔轨道上只站着一个工人，如果你猛转方向盘冲向分岔轨道，你会撞死那个工人，却可以挽救五个人生命。你怎么办？

B. 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桥下一辆失控的电轨车快要撞向车前方五个工人，此时你身边站着一个大胖子，如果你将他猛推下桥，他必死，但他的身躯却可以阻挡电轨车撞死五个人。你怎么办？

C. 你是医生，一天夜里医院突然来了五个轻伤患者与一个重伤患者，只有一天时间，你要么挽救重伤患者的生命，却得看着另五人死去；要么救治五个轻伤患者使其康复，让那名重伤者死去。你怎么办？

春节毕返粤，黄梓姣发现这堂课居然成为同事间的共同话题。7 月暑期至，讨论这堂正义课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实习生、大学同学。

作为一名记者，黄梓姣的经验是，当身边不同圈子的人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或现象时，它往往已构成了一个公共性事件。

果然，在优酷、土豆、开心、人人等知名视频与社交网站，桑德尔的正义课都分别有数千条转载记录与数十万次点击量。其他受追捧的公开课程还包括耶鲁大学的金融课、死亡课与欧洲史等。

普通人接近哈佛的全新“路线图”，实在是 Web2. 0 时代与免费网络商业逻辑联合打造的“DIY 大学”。“在传统教育里，教授者与接受者是固定的。在教育 2. 0 时代，人人都可成为知识的再生产者和传播者，教育会成为一种‘自组织’。转贴、浏览量最广的就是精品，即使没有强大的教育机构支持，通过这种社会自组织形式，教育的触角也能够伸得更远。”多年从事教育公益的志愿者小石说。

在六年前就开始出现为公开课配中文字幕的台湾，这些世界顶级大学课堂的影响力，还渗入到本土高校。OOPS（MIT 开放课程中文计划义工组织）主持人朱学恒说，台湾新竹交

通大学也已开始录制课堂教学，下一学年再上同样一门课时，让学生先看视频，再直接进入讨论。

与常春藤公开课程类似的 TED 也受到中国年轻网民的欢迎。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是一个社会各界精英交流的头脑风暴盛会，创于 1984，现在由 Chris Anderson 创立的非营利机构种子基金会主办。

TED 每场演讲时间都在 18 分钟以内，主题旗帜鲜明，集中于各领域最新最有想象力的发明或设想。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都是它的演讲者。参加过 TED 的人会说，说不定你身边坐的就是一位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得主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这简直就是为网络传播量身定作的，”朱学恒说，“随身携带一个上网本或 iPad，在上下班的地铁上，正好看完一场演讲。”

分享主义者

“未来第六感”——网络上浏览量与转载率最广的 TED 演讲——讲述的是一项即将投入市场的技术革命：数字科技将内化为你身体甚至你思想的一部分，比如，你用四根手指框住一幅你喜欢的景色时，你已经将它拍摄下来了；你在超市买厕纸，你会收到提示，哪种厕纸最环保、性价比最高；当你与生人第一次见面时，你立刻能接收到对方的所有数字信息，职业、毕业院校、爱好、星座……

有个 TED 志愿者负责广东一个学校的演讲放映会，即使来的人很少，他都很有激情地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没有任何的回报，有老师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这么投入？他说自己是个“分享主义者”，把有意思的新东西和别人分享，让他感到很快乐。

美国常春藤公开课程与 TED 的中文翻译义工之间虽交集不多，但他们属于同一类“分享主义者”——

他们熟悉且善于搜索、利用英文网络世界资源；宅家宅电脑，却只是用来工作和学习；对新鲜事物持有婴儿般的高度好奇与执著；真正的 Web2. 0er，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阅读器、挖客或书签，很久没有通过打开一个个网站来搜集信息了；乐于无偿分享自己

的劳动成果，并从中收获成就感与荣誉感；善于在 Web2. 0 环境下，维护及管理松散而高效的义工组织，行动力强。

用朱学恒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高度进化的生物。

人人字幕组负责人之一梁良第一次知道美国常春藤公开课程，是受 VeryCD 内容编辑的一再推荐。字幕组成员相互商量后，一致同意着手翻译。

VeryCD 是执行 Web2. 0 理念的站点之一。

类似的站点其吸引大批流量的原因在于能提供及互享英文网络世界中最新最有意思的资讯及视频，并以开放的姿态调动读者参与贡献内容。

此外，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是，英文信息在全球网络世界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中文资讯——尽管对于大部分中国网民而言已经足够了——仅占总盘的 2%而已。

这些站点的负责人之间联系紧密，2004 年与 Web2. 0 同时诞生的一年一度的中文网志年会成为志趣相投的 Web2. 0ers 建立线下人际网络的重要平台。

TEDtoChina（中国网友志愿发起的，将 TED 介绍到中国的松散组织）负责人之一 Tony，2009 届中山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眼下已经参与组织起广州、北京、上海 TED 的线下活动，主要是在高校放映 TED 演讲视频，邀请当地的各界社会精英发表 TED 风格的演讲，再进行头脑风暴。

7 月 16 日，TEDxYUE（粤）在中山大学北校区举办了一场以“明日医学”主题的 TED 放映会。

创立 TEDxYUE 时，余恺和他的志愿者几乎只是在豆瓣这一类社交网站上吆喝一声，来自广州各高校的自荐信就来了。这正是社交网站高度发展之下的基本通则，高举共同兴趣爱好或相同价值观的旗帜，团结在一个个小组之下。

余恺的初衷是，让更多学生接触到趣味横生的无边界知识和创想。

2010 年 7 月，在牛津演讲的 Chris Anderson 说，TED 成为了创新的催化剂，“现实中，你很想做一个改变，但不知道如何改变，别人的创新思维演讲不一定具体针对你的问题，但使你受到启发。”

余恺到墨尔本读人类学前，其实并不知道人类学要学什么，TED 有个演讲，一个行为研究专家全世界不同地方跑，教世界上不同的人怎么用手机。看了这个视频，他即刻被点醒。

机会平等推进剂

安猪，TED 志愿者，“多背一公斤”公益活动发起人，2010 年 4 月 18 日，和余恺一道赴云南丽江一个偏僻的山村，为当地小孩子举办了一场 TED 风格的 18 分钟演讲。

余恺给孩子们讲了“26 个字母的故事”，过去志愿者常常给孩子们送去物质的东西，但他想给农村孩子带去“1 公斤思想”。纯粹的演讲对山村的孩子不太合适，他就让孩子们围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孩子们似乎看不懂视频演讲的内容，但眼神都非常专注。

余恺将一个叫家园的视频调出来，那是个每人讲一段话的片子，他请孩子们模仿，对着摄像头的孩子们很紧张，余问他们每个人 3 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最想做什么？你最想让爸妈为你做什么？每个表达了自己想法的孩子都很兴奋。

余恺不仅将他的想法分享给别人，其实他最大的益处是通过分享，他也得到了新的启发。

这种“参与式”的思维模式也改变了他过去解决问题的习惯。比如以他的食品专业知识，牛奶很好，但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从来没机会喝牛奶，怎么解决营养问题？他们去了村里两周，把当地市场上所有的材料都买回来，根据当地孩子的认知状况，为他们制作个性化的食谱。

他曾注意到哥本哈根智库提出花 4000 亿美元 4 年时间解决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中国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严重，但缺乏数据，政府层面不会顾及这个问题，去山村演讲的经历使余恺想到一个 idea，如果在平台上发布一个消息，全国不同地方一千多个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做一个最简单的体检，只要身高、体重，只要学校有网络，互联网的协作，就可以将全国农村孩子的营养状况表达出来。

由于资源有限，现实中好的师资向名校倾斜，学生处于一种被教育状态，没办法选择自己受教育的内容，有的学校老师手持二十年如一日的发黄教案。

余恺他们做过一个“平等机会”的活动，在 30 个高校开创新演讲的放映会，有好学校，有普通的，有本科，有专科。网络资源的普及，将好教育的成本下降，只要一根网线，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向世界级大师学习新思维。

“这种网络教育对国人的最大意义是一个机会平等推进剂，只要你是好学的，你可以更容易找到相当优质的资源以及有共同兴趣的人，夸张一点说，即使在山村，只要你足够努力，也能在山村里获得哈佛的教育。”Tony 说。

但现实障碍是，有人英文读不懂；另一个是语境的问题，如果要理解别人的新想法，思维要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有些演讲对某个人可能启发很大，对另一个人则毫无影响。

不过，余恺觉得，这种新思想的学习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比较功利，学生要考四、六级，不关心短期内似乎并不实用的新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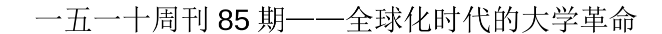
世界学术霸权的大计？

作为第一所公布课堂视频的大学，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每节公开课的制作费用约为 20,000 美元。联系到发源于 MIT 的硅谷文化，其所倡导的开源运动与 MIT 的这一“烧钱”举动颇有相似之处，但从美国常春藤大学接二连三纷纷公开课程来看，单用“义举”来解释似乎未免太过纯良。

看了耶鲁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的金融课导论，黄梓姣觉得那简直是耶鲁的宣传片，“1985 年，耶鲁基金已经拥有约 10 亿美元，另还有些艺术藏品，价值好几亿，从 1996 年至 2006 年，耶鲁综合收益率达到 28%，平均摊在每个学生身上是 200 万美元。并且，这笔钱就放在那里，随时可以折现。”

耶鲁另一名教授保罗・布罗姆在上心理学导论时，开场白便是，“我们将会被摄像，本年度结束时，所有视频录像都会在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通过网络传播到各个国家，为





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们提供便利，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的大计”。

在独立学者安替看来，这句在课堂上引发哄堂大笑的点睛之语才是关键。2008 年，安替作为哈佛尼曼奖学金获得者，成功选上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课，早早坐在桑德斯礼堂里，等待这位在哈佛同样是最受欢迎的教授。

安替说，美国大学各门课程的第一节课被称为 shopping 课，老师需要向学生说明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参考书目以及考试方式，他们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展现自己的学术功底与个人魅力，因为在 shopping 课之后，学生才需要决定这学期是否选这门课。

因此，在各学年初的 shopping 课期间，美国各高校里充满了自由市场竞争的硝烟。2007 年，哈佛校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桑德尔教授赢得了 shopping 课的胜利”。

作为胜利者的桑德尔，不但拥有约 1200 名选课学生的最高纪录，还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在桑德斯礼堂开课的教授。这座华丽考究的礼堂，是哈佛用来举办每年毕业典礼的地方。

开课时，安替注意到，众多没有订上课的学生站满了走道。相比之下，网络公开课程恰恰解决了资源稀缺的问题，并在网络“自组织”筛选机制下，被哈佛学生公认为最经典的课堂也被精准筛选出，受到最热烈的推荐与传播。

“这就是一堂 global shopping（全球推销），”安替说，“哈佛通过展示自己最卓越的课堂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去报考它，耶鲁，MIT，所有美国常春藤大学都会那么想。”

眼下，日本的大学也宣布，将其课堂视频上传网络。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协会自 2006 年起也开始组织试点大学的老师翻译中国精品课程，希望将中国精品课程推介到国外，使中国融入世界知识共享运动的潮流中去。

免费公开课程，正在成为全球人才战略的全新战略手段。

可以想见的未来，当各国高校将其最优质的课程上传网络共享，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网络“自组织”筛选机制下，被筛选出的最优质课程将对处于弱势的教育资源产生巨大压力。显而易见，各国最优秀的人才完全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朱学恒告诉本报记者，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各国字幕组的兴趣仍集中在翻译英语网络资讯上，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公开课程是受到非英语国家一致推崇的。而亚洲网络世界的内容，除了日本的动漫，吸引力仍集体处于弱势。

罗伯特•希勒的金融课程在中国年轻网民中颇受推崇，原因之一在于他所推崇的直白商业逻辑，“人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社会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并没有亏欠，而且我们也不必为追求经济利益感到内疚。”

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课是众多免费课程之一，按经济畅销书作家克里斯•安德森提炼的网络时代下的免费商业逻辑，免费的目的，是为了催生一个巨量的新经济。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商业概念。

余恺认为，中国人并不缺乏创新意识，更多时候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

他在演讲中看到印度的农民也会讲自己的创新故事，中国的农民其实也很有想法，但可能是中国教育的原因，中国人讲出来的故事比较机械化，很难讲得打动人，外国人非常追求差异化的表达，“可以说你不知道，但说出来就得和别人不一样。”

“中国的大学应把更多资源不是仅仅用在建漂亮的教学楼上”，余恺说，而是帮助学生游学世界各地，去感受这世界本来是圆的，但也可以是平的，是热的，是挤的，是湿的……

（实习生余梦溪亦有贡献）（黄梓姣为化名）

（潘晓凌，南方周末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47995）

【返回目录】



8-4 《纽约时报》：柏林墙要倒了！（译言网）



“欢迎来到全新的“大型公开网络课程”（MOOCs）的世界，它是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工具。数十年来，理论上讲，免费的网络课程蕴含的巨大潜力激起了大家的兴趣，但事实上，过去的几个月时间，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积极进取的学子们，由于没机会读大学，他们把网络课程视为学习高端技术还有获得高薪工作的捷径，而他们不用交学费或获得大学学位认可。于此同时，某种程度上一些人视网络课堂是传统高校的威胁。现在的某些课程有些是颁发非正式的证书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课程是收费的。）”

在线课程的极力宣传就像深夜播放的电视广告，或地铁里张贴的海报：“7 周的编程学习将从 2 月 20 号开始，我们将传授给大家充分的计算机科学知识，也让你设计出如谷歌或雅虎那样的搜索引擎来。”

这堂“创建搜索引擎”的课由两位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执教，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兼谷歌工程师巴斯蒂安·特龙，另外一位是弗吉尼亚大学在休假当中的教授大卫. 埃文斯（David Evans）。

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是课程的一大亮点啊。自 Udacity 网络课程后，盈利机构启动了现有课程，1 月 23 号注册的，就有 9 万多学生报了搜索引擎课程，还有另外一门特龙先生教授的，他还领导谷歌的租赁汽车的开发。

欢迎来到全新的“大型公开网络课程”（MOOCs）的世界，它是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工具。数十年来，理论上讲，免费的网络课程蕴含的巨大潜力激起了大家的兴趣，但事实上，过去的几个月时间，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积极进取的学子们，由于没机会读大学，他们把网络课程视为学习高端技术还有获得高薪工作的捷径，而他们不用交学费或获得大学学位认可。于此同时，某种程度上一些人视网络课堂是传统高校的威胁。现在的某些课程有些是颁发非正式的证书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课程是收费的。）

考虑一下斯坦福的遭遇：去年秋天，190 个国家的 16 万学生报了由特龙还有他谷歌的一同事诺维格（Norvig）合开的“人工智能”课。此外还有 200 人在校园里选了这门课，但开学不到几周时间，斯坦福大学的出勤人数就少了约 30 人。因为一些同学有了双向选择，比起亲自见教授们听课，他们更倾向于网络视频教学，手里拿支笔，问题就得以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对网络课程的规模特龙先生狂喜不已，目前课程孕育出自己的文化内涵了，其中包括 Facebook 的组织，在线讨论以及大批的自愿者翻译们，他们将课程译成了 44 种语言。

“做了这一块，我就没法在斯坦福任教了。”特龙教授 1 月份在德国的一场数字会议上表示。“我觉得就好像有两种药丸，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蓝的。你吃了蓝色药丸，就能回到斯坦福的教室课堂上给我的 20 位同学讲课。但我吃的是红色的那个，我同样看到了仙境。”

除“人工智能”课外，斯坦福大学还开设了 MOOCs 的其它两门课——一是“机器学习”（104000 人注册，13000 人完成该课程），还有一门“数据库介绍”（92000 人注册，7000 人完成该课程学习）。春季学期斯坦福有 13 门课程是向世界开放的，包括解剖学，密码学，游戏理论和自然语言处理。

“我们的网络课程仍在完全试验阶段，我们也正在考虑努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方法。”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约翰. 艾许曼蒂(John Etchemendy)表示。“我们责任就是教育，世界范围内能够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的任何做法我是全力支持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考虑，一是版权问题，再者如果颁给接受网络课程教育的学生人为的证书，并且冠以斯坦福大学的牌子的话，这对我们资格鉴定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特龙先生就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完成人工智能课程的学生一个 PDF 文件，标明了他们的百分制得分，但是没有以斯坦福大学的名义，248 名学生（不是斯坦福的）取得了百分比的分数。

对很多早期的网教狂热者来讲，网教公开承认目标是改变世界而非仅仅是赚钱。但 Udemy 网教课程（受益于团购网创始人的支持）开办以来却希望用户广泛使用该网站最终获利。而特龙先生在查尔斯河公司支持下成立的的新网教公司 Udacity，从本质上讲，也正计划从学生的技能增长中（如帮他们找到工作）敛财了。

“我们也将对学有所成的数以千计的学生进行详细的记录，他们有很多希望自己所学受未来老板赏识。”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文斯表示。“如果一名招聘人员想从 100 位候选人当中挑出在地理和机械领域都有所造诣的最佳人选的话，我们就能造就这样的人才，但是要收点钱的。我认为这是一场革命的开端。”

2 月 13 号，麻省理工学院正在推出它的未来 10 年的在线课程资源，也公开注册了首个 MOOC 网络课程—电路电子课程。这节课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项目的原型，它终将推出大范围的课程，还为完成这些课程的学子们颁发某种证书。

乔治亚理工学院也试验性地开设了两学期的名为“改变 11”（Change 11）的大型公开网络课程，课程是以自由活动论坛形式呈现的，多是学生间的问题发布解答之类，而非以教授轮流布置正式学习资料的形式——只有两门课程将得到学院的学分。明年，乔治亚理工学院“21 世纪大学”实验中心主任理查德. 迪米罗希望通过各个大学的网络整合一个大型的公开网络研讨班，并且可以提供学生学分。

网络课堂平台 Udemy 目前宣布其推出了新网教课堂“教员工程”(Faculty Project)，一些享有声望的教授们（如英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还有西北大学的）提供免费网络课程。网站合伙人葛根. 比亚尼表示已经有 10 万多学生注册了课程，还有几门项目外的收费课程。

专家表示有几个原因把 MOOCs 网教推向了教育舞台的中央，包括科技的日新月异，还有传统大学天价的花费。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以盈利为目标学院的先例，表明了我们进军大型网络课程是极有可能的。”独立政策学院，教育部政策主任凯文. 凯里表示。

五年前，乔治 • 西门子（George Siemens）创办了 MOOC，为公开教育开了先河，网络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所教授的课件，这一下子吸引了 23000 名人参与，还把课程大纲译成了几种语言。身为阿色巴斯卡大学（加拿大公费支持的网教机构）教授，西门子表示，大型公开网教模式已经开创了别开生面的社交网络，这点很清晰了，同学们可以自发地在网络平台上广泛地经行讨论。

“很多同学通过第一节课和其它同学形成的关系都持续到现在了。”身兼乔治亚理工大学项目推进者的西门子先生表示“我们发现在网教平台上，不再以教室为中心了，这个平台反而成了社交关系的集合点。”

目前的技术支持更加集中的 MOOCs 网教平台高度自动化了，有电脑打分的专业和考试。但社交空间仍很充足。例如斯坦福的 MOOCs 网教课程就包括虚拟办公室时间和在线讨论论坛，在那块学生可以互相提问和解答问题，并且表决——那点太重要了，需要听听教授的意见。

“课堂上，你如果问个问题，由一个同学回答，其它人就没有机会了。”特龙先生表示。“在线网教课程拥有嵌入式的小测验，人人都能试着回答问题。如果他们理解不了，他们能回过头去一遍遍听课程直到听懂为止。”就像一个小孩学骑自行车摔倒了，你不能打击他说“你得了 D 太差劲了，”你应该鼓励他不断去尝试，他表示网络课堂里学生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能帮助他们不断练习直到完全掌握内容。“我们的目标应该让每个学生达到 A+的水平。”

上学期特龙先生课程的几个学生是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的。MOOCs 工作人员透露说。

Balakrishnan Srinivasan，45 岁，班加罗尔（印度南部城市）的工程师，表示他经常重复看课件视频，他感觉“有了私人家教似的”。他的人工智能课得了 94. 8 分，并且他已经选了 Udacity 网络课程的两门课。

Brian Guan，44 岁，出生在马来西亚的软件工程师，现居加州帕洛阿尔托（译者注：美国旧金山附近城市）。在一次邮件采访中，他展望了一幅乌托邦的画面："我希望，这种使用毫无限制、绝对自由风格的学习方式可以提高全人类的知识文化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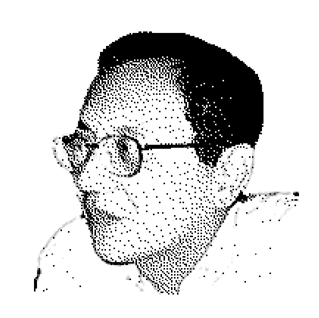
（TAMAR LEWIN，纽约时报记者。译者 janet985。转载自译言网。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288434/258560）

【返回目录】



【论】

8-5 吴澧：互联网能否取代大学教授



“笔者并不觉得网络课程能取代美国大学的课堂教学，但或许会将指定的课前阅读材料，更多地转为网络视听内容，包括网络课程。不过，对那些习惯满堂灌的教授，还有普遍如此上课的大学，网络课程确实是威胁。如果同样是满堂灌，为什么要去教室？完全可以躺在沙发上，观看顶级教授的网上高水准表演，笔记则让语音识别软件自动代劳。”

近年来，美国高教界一直有个顾虑，担心自己会像唱片行业和实体书店那样，被免费的网络共享或成本很低的网络交易搞垮。2012 年 7 月 17 日，狼真的来了！在线教育公司阔思啦（Coursera）宣布，又有 12 所大学同意向该公司平台提供免费网络共享课程，使得这样做的学校达到 16 所。数量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这 16 所学校的级别。原先 4 所已经赫赫有名：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新加入的 12 所里，不但有加州理工学院和乔治亚理工学院这样的理工名牌；居然还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医科王牌——考虑到医学院的昂贵收费，网络共享对他们应是最不利的；另外还包括 3 所美国之外著名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瑞士的洛桑理工学院。

阔思啦由斯坦福的两位教授创办，其中一位还是祖籍香港的华人吴恩达。之前他们提供的主要是计算机课程，还有些相关的数学和工程课。这次大扩展之后，阔思啦将在秋季开始提供少量文史哲和医学课程。笔者登录看了一下，页面很简单，一点不花哨，但使用很方便。顺便注册了一门美国现代诗歌，由宾州大学提供。现代诗歌还没有完全“经典化”，还没有定型为非讲不可的那么几首，教授选讲诗歌时余地比较大，也比较容易讲出新鲜感。虽



是网络免费，教授也声称不要求学生预先具备任何阅读诗歌的经验，但他显然还是有所期望，委婉地建议：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选集各买一本。

阔思啦目前只提供一百余门课程，与美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动辄数千门课程相比，实在是小意思。课程安排也没有连贯化系统化，目前显然不可能提供学位。但对美国高教界已造成很大震动。2012 年 6 月份，弗吉尼亚大学闹了一场全美瞩目的董事会罢免校长风波，理由就是女校长特雷莎・沙利文改革不力，没有积极尝试网络课程。结果引起师生反弹。教授们说：如果今天可以为了吸引眼球而罢免校长，那明天是不是要以同样理由关闭德文系？学校其他高层领导也威胁要辞职。董事会被迫召回沙利文，仍然请她当校长。这次阔思啦新签约的 12 所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正是其中之一。

这场风波，很好地体现了推行高校网络教育的内在矛盾。管理层要推。虽然现在不记学分不授学位，但网络化是大趋势，所以现在就要抢占高地，竖起牌子，在全球学子心目中打出知名度。这样才能在网络化大潮卷来时，不至于像中小型书店那样，第一个被“亚马逊”挤出市场。弗吉尼亚大学虽是历史悠久的好大学，毕竟没有哈佛、耶鲁般名声，管理层难免更焦急一些。

但教授有饭碗的担心。假设宾州大学一位教授的网络诗歌课能吸引好几万学生，其他大学的英语系教授怎么办？这让笔者想起语言学课上听来的一段故事。电视机刚发明时，各路教授忧心忡忡，担心学生从此不读书，担心电视授课砸掉自己饭碗。只有语言学家欢欣鼓舞，以为从此之后语言学习小菜一碟。后来的事实证明担心欢欣皆无据。语言学家发现，单是看电视，并不能使哑巴的孩子学会讲话。原来，儿童学讲话，一定要跟成人对话，需要成人不断提供反馈和矫正。没有电视人物与坐家观众的互动，美国电视里的知识节目，比如“芝麻街”，连小学都取代不了，更不要说大学。

美国的本科教育，特别是文科，讲究的是对话和论难教学（dialogic and dialectical teaching and learning）。Dialectic 这词，国内通常理解为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这里是指发现对方论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课，事前布置阅读材料一大堆，就像那位教诗歌的宾州大学教授，2012 年 9 月初才开课，他先布置两本诗集，还有其他网络视听内容。上课主

要是师生对话和讨论。现在都讲“政治正确”，老师通常不会直接反驳学生，若是面对少数族裔学生更不敢反驳，哪怕明显错误，但仍然会试着将学生导向学术性思考。这种对话和论难，是对学生思维的很好训练，而网络课程至少目前做不到。

笔者并不觉得网络课程能取代美国大学的课堂教学，但或许会将指定的课前阅读材料，更多地转为网络视听内容，包括网络课程。不过，对那些习惯满堂灌的教授，还有普遍如此上课的大学，网络课程确实是威胁。如果同样是满堂灌，为什么要去教室？完全可以躺在沙发上，观看顶级教授的网上高水准表演，笔记则让语音识别软件自动代劳。

（吴澧，旅美学者。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78987）

【返回目录】

8-6 钱理群：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
——读马小平老师的教育札记和对话



“‘本质意义上的教师’概念的提出，将教师与人类文明的传承紧密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特殊的知识阶层’，提出了高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同时也就树立起了一个高标尺。其实这本是不可退让的底线，但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下，就是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梦话。”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先后在东莞中学和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和他的学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东莞中学 2001 届的王翔和 2003 届的黄素珍）对话中完成的：他启蒙了学生，学生的思考又深化了他的思想。而我也是通王翔而认识马老师的；作为他们师生的朋友，读了这些对话，也产生了许多想法。于是，本文的讨论，就成了马老师和他的学生，以及我之间的一个对话。

（一）一生中总在追求达不到的境界

在一次对话中，王翔对马老师说：“你身上有一种很浓的少年气质，一种不平静的东西。你有一种燃烧的东西”，“你的这种少年气质到现在还能如此，在精神上没有缓慢下来的感觉”。

马老师如获知音，立刻回应说：“我一生中总在追求一种我达不到的境界。我对智慧的东西总是在追求，而对非智慧的东西是非常的反感”。

王翔接着这样谈他的理解和感受："怎么解释你这样做呢？只能说是有一种内在的压力促使你这样做，一种本质的对美的追求促使你这样做"。

马老师又接着这样谈到王翔和自己："你也有这种燃烧的气质。但是你的燃烧是在烧自己，却往往没有让别人感觉到，而我的燃烧常常能够让别人感觉到，这可能与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有关"。（《语文教学对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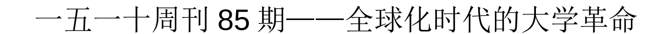
师生之间能够达到这样的理解和契合，是令人感动和羡慕的。在我看来，这是理解马老师其人，以及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关键点，一个切入口。

马老师在《寻找一种向上的力量》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具体谈到他的追求，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和一位中学同学，大学时代的好朋友，一起迷恋于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我们常常为苏霍姆林斯基而感动，常常为我们的感动而感动。当时环顾我们周围，有几个人能像我们那样热爱教育？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一辈子，只要能到一所像帕夫雷什中学那样的学校去教书就值了。后来参加工作，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在等待，在准备。我的一生就为了等一所这样的学校"。一生都在寻找，等待，准备：这是怎样的一种追求！而且马老师真的坚持下来了；他说到后来又见到了当年一起寻找的同学："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事情，似乎有些害羞。总觉得那时太幼稚了，太好笑了。在现实中他的理想早就已经被碰得粉碎了"，他因此而感慨："坚持是多么的艰难啊！"但他自己是不知悔的："我这一生注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选择了这种活法"，"我可能有一种执著狂"。

其实，这样的执著的背后，是有一个人生目标的设置的，就是要追求"最高，最强，最好"。马老师在文章里，就是这么说的："干教育这一行，如果不是十分地热爱，干得不愉快，而且还痛苦，那就真正要赶紧改行。但是我们如果执意选择教育，那我们就得朝最好的方面去做"，"要好好挖掘自己的才干，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埋没了"，要使自己能够"成为人物"。

于是，就有了马老师的教育命题："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这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副题就是"又想起了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不要看轻"中学教师"的意义和价值，更不要低估"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他的生命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潜能。





我们不妨看看马老师的学生是怎样看待他这位“普通的中学教师”的“一直以来，面对字字经典的课本，我都有一种浓厚的压抑和窒息感。陈旧、单调的课本无法被我本能地接受，而考试又如达克摩利斯剑般悬在我头顶，令我不得不做一名思想的奴隶。马老师一肩扛住了沉重的闸门，指引我们走向辽阔”（王翔）。

“您让我聆听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的生命之言。‘安魂之所’、‘为活着寻找理由’、‘对生命的理解’、‘对卑微生命普遍尊重’、‘在未来与现在之间拉开一个时间的距离来思考’、‘理想主义者的姿态’、‘苦难时代中的生存状态’、‘生与死的思考’-------等等，每个问题，每个智慧的话语，都逼我思考。您让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沉静下来，您让我摆脱庸俗，再次审视自己的灵魂，再次重检和重建自己过去的种种观念。或者说，你给我指出了许多道门，门还是关着的；而现在及将来，我都将去努力扣响每道门，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打开它们。但我知道，很多事情，哪怕穷尽一生，到头来，也只是一团若即若离的迷雾”（黄素珍）。

“您曾经给了我一个漫长的期待。------您就在我的身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您独特的引人思索的话。我静静地听，在不断惊喜的茅塞顿开中感觉着心中思想渐渐地丰盈起来-----”（黄素珍）。

“老师，您曾说过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什么叫理想主义者？是不是可以放弃一切物欲追求，追求心中的自己的理想？是不是只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境地和慰藉？老师，上完您的课，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追求：一生从事教育，如您一般地给学生教授人生那些美好的情感，哪怕一生清贫！这是郑重的承诺，要负上全部的对自己的责任”。（黄素珍）

王翔因此说要把他的文章献给“马老师，以及与马老师一样的高贵的教师”。在他心目中，教师永远是“高贵”的；他说：“我们的骨髓里，血液中，灵魂深处，应该有一种叫崇高的东西。那样，我们才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他在马老师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的生命中，发现的就是这样的“崇高”性。

黄素珍则把她从马老师这里所受到的感动，上升为对教师的意义的理性把握：“教师其实是一特殊的知识阶层。他（她）的特殊在于他（她）承担起责任的神圣与其重大作用。他（她）不仅要具备知识分子所有的来源于内心的批判精神和对历史强烈的反思，承担人类共同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感，他（她）还具有献身于人类文明的传授的精神。他（她）面对的还



有学生这人类文明传承者的下一代。若某个知识分子蜕化，成为某一个私欲目的的追随者，还可以原谅；但若教师蜕化，就绝不能容忍。教师一旦蜕化成世俗的、权威的工具，就不再是本质意义上的教师，也不可能担当知识分子的称号。教师应该永远在心中铭记个人责任的不可推卸。他（她）要有比普通知识分子更坚定的原则与信念。任何掩饰疏忽，个人力量薄弱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是纯粹意义上的教师”。

“本质意义上的教师”概念的提出，将教师与人类文明的传承紧密联系起来，将其视为“特殊的知识阶层”，提出了高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同时也就树立起了一个高标尺。其实这本是不可退让的底线，但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下，就是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梦话。但心中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却恰恰是到教育事业寻求生命意义的教师和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教师匠的区别所在，它所唤起的是前文所说的自觉而愉快的教师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神圣感与崇高感。这样的精神境界，是“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的。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仰望星空”吧。

于是，就有了马老师的“一生总在追求达不到的境界”，以及“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的命题的提出。

（二）“与灾难赛跑的教育”

黄素珍在她的《我的教育理念》一文里，还为当今的教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教师就是实现教育走出危机，摆脱困境，达到人类最高生存意义的人”。

马老师则在他的文章里，一再提及英国学者汤因比所提出的“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的理念，并且这样谈到他的理解：“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人文素质教本。写在前面的话》）。

无独有偶，最近我在杂志上读到龙应台在台湾大学的演讲：《我离世界有多远谈 21 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也是引用了历史学家威尔士的话：“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他们这样的一再引述，是出于对 21 世纪世界的基本判断，也就是说，他们是在 21 世纪的世界大格局，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下，来审视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及所必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马老师早在 1999 年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面向知识经济，培养一代新人关于普通中学迎接 21 世纪的教改设想》，明确提出“教育究竟应如何变革”，“才能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的问题，并且强调：“要想在 21 世纪获得成功，必须从教育改革入手”，因此，作为一个教师，包括普通中学的教师，都要以“对国家与民族”和“对人类的前途”的双重责任感，来面对我们的教育。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思考，这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的思考“能够走多远”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注意到，龙应台在她的演讲里，也是在强调，21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村”里，因此，我们今天来谈教育问题，“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国家’，而必须以‘全球村’为单位来思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单一国家的解决”。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我们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思考教育改革时，只局限于中国一国范围的观照，而看不到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世界性，更不能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思考这些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以全球的眼光来寻求出路。当然，全球化并不否认民族特点，我们的教育问题自然也有本国历史、文化所造成的特殊性；但走出单一的国家、民族视点，追求更为开阔的全球视野，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具有某种迫切性。

那么，21 世纪人类又面临着什么问题，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马老师在他的文章里，作了这样一个判断：“进入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机会确实不少，但是面临的各种灾难也越来越突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龙应台也说：“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有歧异纷争的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战争威胁的时代”。

这又是一个有力的预警。而我却是在经历了 2008 年的灾难和冲突以后，才有所醒悟，在一次演讲中，作了这样一个判断：“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难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并且有这样的分析：“因为我们将面临两大紧张。首先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大紧张。20 世纪人类在推行工业化的现代化时，对大自然的过度破坏，到 21 世纪必然遭到大自然的‘反抗’”；“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信仰、价值，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个体，都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来往越来越密切，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成了国际问题，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密切接触、联系，固然使人的生命越来

越相互依存，产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时也必然是摩擦不断，冲突不断”（《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

黄素珍在她的文章里，对人类文明的危机及其产生的教育危机，作了更为具体与犀利的分析。她指出，人类文明曾遭遇到战争和极权的威胁，形成了教育的危机：“在战争时代人类强烈地感到极权与暴力代替理性与正义，人类道德趋于崩溃的时代，教育不可避免地沦为政府和政治向青年人强烈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极端地对异族仇恨和报复的毫无自主的工具”；而在当今世界，不但战争和极权灾难依然存在，“新的危机又像利剑般悬挂于教育之上，而这又是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危机来源于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顶礼膜拜”，“来源于不平等的存在，人类间种族仇恨的加深”，“来源于在科技强大力量的作用下人的孤独、恐惧的困境”，“来源于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渴望被承认、被尊重的欲望下导致的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状态”，“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更多的有良知、有坚定信念、不屈服于权威、有着人性力量的献身于人类的知识分子”，“来源于教育本身还很软弱，她时时向学生暗示着人性道德败坏的部分：生存的艰险，人的不可信任，真理的难以被理解，竞争的残酷，人的力量的卑微，崇高易被曲解、污蔑，以至使学生失去自信，变得怯弱”。

可以看出，黄素珍对教育危机的观察、体认，是包含了她作为一个中国的中学生的实际体验的，但她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教育危机”的命题，更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可以说 21 世纪的灾难与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的广大地区依然深受不发达之苦，存在贫困、疾病、战争、人权等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深受由 20 世纪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主要标志是科技的发展与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主要体现就是马老师早就提出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精神危机，以及新的不平等。它的危险性，如龙应台所说，就在于可能导致“文明的腐蚀和毁灭”。

问题是，这样的 21 世纪人类危机，主要是由我们的学生，中国与世界的年轻一代来承担的。正像我在汶川地震（在我们的讨论中，是可以把汶川地震看作是 21 世纪人类灾难危机的代表和象征的）以后对北京的大学生所说的那样，“汶川地震以后，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而能不能面对，参与，承担，所起到的作用，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里的关键，就取决于年轻一代的素质：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是一个

对人的挑战，人的素质的挑战，对培养人的教育的挑战。这关系着人类文明的命运，这就是马老师一再引述的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这就是“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的意义所在。

（三）“全球公民”：21 世界需要什么人才

接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应对 21 世界的人类灾难？或者说，21 世纪的人类与世界，21 世纪的中国，对人的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马老师在 1999 年所写的文章里，主要从 21 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对人才的新要求，强调了人的脑资源的开发，人的潜质和个性的发挥；终身学习的观念，能力和习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面向知识经济，培养一代新人》）。最近，我在和北大学生的谈话中，也说到在知识社会、信息社会里，“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就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由此而提出了这样的人才观，“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未来人才的竞争，将是“一个素质的竞争，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

也许更值得重视的，是龙应台在她的演讲里，从全球化的角度所提出的人才观。她指出：“全球化真正迫切的议题是：人类社会如何透过合作来保障地球环境的永续可能，透过协商来解决超越国界的贫穷，疾病，战争，人权等问题”不难看出，这正是对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21 世纪的灾难与危机的一个回应，所提出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任务和目标。

正是从这样的全球使命出发，她提出了一个“全球公民意识”的概念：“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单一国家的解决。以单一国家为范围的公民意识势必要转型成另一种东西，叫做‘全球公民意识’”。她指出，如果在 20 世纪，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以道德、知识和行动来对他的‘国家有难’负起责任”，那么，今天我们对年轻一代的期许，“就不能局限于‘国家’，而必须以‘全球村’为单位来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要进行的是“全球公民教育”。这是全球化时代，21 世纪全球灾难与危机所提出

的一个全新的教育课题。黄素珍在她的《我的教育理念》里，曾经提出一个“设立全球化的教育机构”的设想，看起来似乎是过分理想化了；但她其实是敏感到教育的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化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这又是一个超前的思想萌芽，因为至今这样的全球化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还没有进入中国教育的视野。

据龙应台介绍，国际乐施会对“全球公民意识”下过这样的定义：

“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份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深切认识到人类需要去理解并且积极以行动去解决全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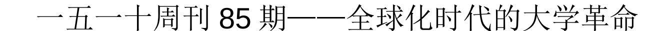
“全球公民意识指的是我们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以行动去保障它永续未来。

“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坚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

“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是：他的关照超过他的本土而且自觉是全球的一员；他尊重多元的价值；他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联和运作有所了解；他对不公不义的事会感到愤怒；他会参与，不论是当地的或国际的事物；他愿意以实际行动来为地球的永续而努力，他对人类的未来有责任感”。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些核心价值：如责任，承担，公平，正义，宽容，民主，参与，行动，等等。如龙应台所说，这其实是积淀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具有永恒性的教育的核心价值。它和 20 世纪的教育价值观有着历史的承接，但它显然又有 21 世纪的时代特点：无论是责任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扩展为全球性的关怀；更强调价值的多元及对多元价值的尊重；更要求行动和参与，等等。这样的“世界公民”必然是视野开阔，胸襟廓大，智慧，善良，有担当的新人。

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全球公民意识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在我看来，2008 年的汶川地震成为“全球之痛”，许多国家的志愿者和中国志愿者一起共同承担救灾的责任，以及全球运动员、观众对奥运会的热情参与，其背后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全球公民意识。而我们的某些



舆论媒体却按旧的思维方式，将其纳入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模式，从而失去了一个进行世界公民教育的大好时机，这是非常可惜的。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我还要补充的是，强调“世界公民”和“世界公民意识”，并不是否认、抹杀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我们毕竟还没有达到“世界大同”。相反，我们也要强调，世界各国的公民，都会有自己本国遭遇的问题，从而对公民意识提出或强化某种要求。这里，不准备讨论中国国内的问题，而想谈谈全球化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人才素质培养所提出的新问题。这也是我在 2008 年发生了许多事件以后，对北京的部分大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和自己有着不同信仰、价值、制度的西方世界相处？”我说，这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过去的一般的西方老百姓并不关注我们，因为我们贫弱，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一个遥远而多少有些神秘的存在。而现在，由于我们日趋富裕与强大，由于大家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比如说中国货，已经进入了西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成了和他们休戚相关的存在了。于是，中国开始成为西方人关注的对象了”，“应该说，这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时代的一次相遇。双方都是独立的，并且都足够强大，但彼此的信仰、价值观，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又是这样的不同。在这样的新的情势下，彼此如何相处？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疑惧和误会，摩擦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这里，实际上也就提出了一个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将怎样的面对世界？需要怎样的观念，素质和姿态？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民族立场和世界公民意识的关系问题。我在演讲里，提出我们不能没有民族立场，爱国情怀，在世界面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要“尊重别人的信仰，价值，制度”，“在交流中要善于换位思考”，“学会从对方吸取、补充和发展自己”，“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在普世性的价值基础上寻求心灵的沟通，生命的交融”，并积极参与全球性事物，参与国际合作，尽到“全球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我还特别强调了“宽容”，指出“我们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势众，唯其如此，我们就一定要宽容对待异己者，不要以势压人。要习惯于总是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提出质疑，批评；要习惯于被人误解，猜疑，以至反对。对这些异己者的声音，要择其善者而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但不必作过激反应”，并提醒“在国家意识特别强烈和民族精神高扬时，尤其要注意尊重和保护个体的独立选择自由，少数人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这当然是有感而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防止引向

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中华中心主义的复活，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的年轻一代应该自觉地作为“地球村”的一个成员，以独立，自信，理性，合作，谦和，大度的姿态，出现在 21 世纪的世界。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234）

【返回目录】

【思】

8-7 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



“‘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教育全球化”是人类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等三种具体形态，深入研究“教育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和动力机制等问题，抓住现阶段“教育全球化”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制定和实施“全球定位战略”，对于确保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教育全球化 国家安全 全球战略

从“经济全球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全球化”分析框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规范。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背景，同时也为人们在大的历史尺度上透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把握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用“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观照其它领域的人类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事实上，目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已经不限于经济活动，除“经济全球化”以外，在“全球政治”、“全球文化”、“全球战略”、



"全球主义"、"全球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二十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全球学术现象

比较而言，"教育全球化"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本文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希望通过对"教育全球化"的现象、历史和机制三个方面的初步研究，揭示"教育全球化"给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带来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以及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问题。

一、"教育全球化"的基本形态

"教育全球化"是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

"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 WTO 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为中国教育发展在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之外增加新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学；

第二种方式，在国外接受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

第三种方式，接受国外教育机构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教育；

第四种方式，在全球聘请优秀教师；

第五种方式，利用国外知识产权；



以上五种方式又可分为三类，一类以各种教育资源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特征，如第四、第五两种方式；第二类以接受教育服务为特征，如第二、第三两种方式；第三类是以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前提的教育服务提供，即第一种方式。从最有利于中国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来看，以第一种方式，即吸引外国资本来华办学最为可取，不但可以增加国内的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在投资意义上的乘数效应和增加就业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有助于改善中国教育系统的整体素质，与经济领域吸引外资有异曲同工之妙。

留学生是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逾 50 万人，目前已回国十几万人，相当于我们不花钱就在国外办了一所规模达 50 万人并且是利用全球优秀教师及其他教育资源的专为或主要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超级大学。这种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们调整留学生政策，鼓励出国留学和回国服务的重要基础。除此以外，企业员工，特别是三资企业员工利用跨国公司的全球培训体系进行职业培训，也是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

以第三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才刚刚开始，但却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为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无限制教育资源共享的有效方式，它突破了传统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时间、地点和身份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也克服了由此产生的对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和排他性利用的限制，在理论上全世界的学习者可以同时看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做同一道题、参加同一个主题讨论，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参与全球前 100 名大学的实时教学，同时可以共享全球前 1000 名大学的优秀教师资源，那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目前对此作出准确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在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发展中将会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以第四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在发达国家是一种常例，但这种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方式在中国目前还主要限于语言教育，在其他专业教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今后在这一块将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果用百里挑一来形容优秀教师，我们在全球招聘一万名优秀教

师就只相当于花费了百分之一的培养成本，无怪乎人们要惊叹美国成了全球人才收割机，其实，这个“收割机计划”我们自己也可以实施的。

以第五种方式利用全球教育资源有两个重要领域。其中之一是利用国外教材，这一点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开展国际和校际间的课程认证与学位认证，可以有助于我国学校特色的形成和有效提高我国学校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以上五种方式之外，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方式是对其他国家教育成果——优秀学生的利用，这方面美国的表现最为优异。我们注意到，对美国教育的评价常常表现出令人困惑的矛盾：她的基础教育经常受到美国国内和国外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从五十年代的课程改革到九十年代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都是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否定评价之上的。尽管如此，美国却有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和最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她的经济发展也未受到那个“低劣的”基础教育的困扰，这是传统教育理论难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传统教育理论把一国教育体系限制在该国疆界内的思维定势，同时注意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美国教育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式的高效率的全球化教育体系，以此分析上面所说的矛盾也就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争取各种国际捐赠和项目融资也都是利用全球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

二、“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因受到地理障碍的阻隔而处于各自独立的孤立发展状态，各国的教育也因此表现出广泛的差异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教育体系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取长补短，显示出强烈的趋同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全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从而为“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对“教育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考察表明，构成“教育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变迁的动力来之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变迁的基本方向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精

英走向大众、由集中走向分散、由单一走向多元。与此同时，一国教育体系变迁的微观过程又与全球教育体系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一国教育体系的变迁与传导为演化动力的全球教育体系。

是否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不但不存在一个“全球教育体系”，甚至什么“西方教育体系”之类的跨国界概念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存在的只是“美国教育体系”、“英国教育体系”、“法国教育体系”等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尽管国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重要边界，一国之内的教育活动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也与他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不同国家的教育活动在观念、内容、手段、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基础，况且不同国家教育活动的相互影响已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同国家经济活动的差异性而否认全球经济体系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否认“全球教育体系”的存在。显然，本文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三种主要的动力模式——“要素流动”、“模式复制”和“资源共享”，分别对应上面所说的三种主要的“教育全球化”现象。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模式，我们可将“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对开放国内教育市场倒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制定了更有吸引力的留学生政策，从而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本国人力资源发展中陷于更加不利的处境。

三、“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首先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四、“教育全球化”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

作为“全球化”历史趋势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它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国家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占领和反占领，侵略和反侵略都与国土纷争有关。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

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与政策创新才能保证国家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教育发展全球战略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应对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国家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创新，抓住“教育全球化”在现阶段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

我们已经论证了扩大教育规模和提升国民教育层次对于国家中长期战略安全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全球战略的要点就是“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和“开拓全球教育市场”，这种新的全球战略叫做“全球定位战略”，即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确定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

“共享全球资源”的基本思路是“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

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在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抛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而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则更多的是防止出现“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开拓全球教育市场”的基本思路是“积极主动和坚定不移地进入全球招生市场、全球就业市场和全球师资市场。”

在“开拓全球教育市场”，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的整体设计中，利用国外教育资源以增加国内教育供给只是该战略的要点之一，与此相互为用的另一要点是，通过宣传、挖掘和引导，充分利用全球教育需求资源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即在作为教育资源输入国的同时，积极扮演教育资源输出国的角色，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

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传播目标。

为什么在我们自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同时还要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呢？现在我们来算一笔帐。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就是增加了中国市场的消费力量，设若一个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一年的消费总计为一万美圆，如果我们能吸引一百万留学生，就是一百亿美圆的外汇收入！如果实现这一百亿美圆的教育产业产值并不以抑制或减少国内本国公民的教育消费为代价，那又何乐而不为了？事实上，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国外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来华招生活动表明发达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而美国则是通过这种途径获益最大的国家，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入国。据最近报道，北京市在 2000 年留学生的进出已经平衡，因接受外国留学生而增加的学杂费收入已达 9 亿元人民币，我们把这看成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随着中国在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作为留学目标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第二，与此相关联，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教育旅游”或“旅游教育”，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各国开发形式多样的现代“游学”项目，留学生可以边游边学，昼游夜学，游学相间等等，使中国古老的游学传统成为发展现代教育产业的利器。

与进入全球招生市场相比，进入全球就业市场是一个难度更大，同时价值也更大的教育产业领域，但只要我们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积极进行市场开拓，突破传统思维的约束不断开拓创新，前途依然无限广阔，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跳出中国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

（吴华，浙江大学教育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236）

【返回目录】

8-8 D. Bruce Johnstone：世界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大学变革’，不单是指大学本身的变化，而是指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的变化。而如果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讲授新的课程、或与学生和社区建立了新的关系、或从事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如果学生有了新的选择、或承担了新的责任、或改变了学习方法；如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有权力做出新的决定、或者按一套新的规则运作，并且这套新的规则会影响资助什么和不资助什么、解聘谁、奖励谁等方面的决定；那么大学才是真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本文是 2002 年 7 月在北京由中国教育部主持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演讲稿。本文提出了在 21 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挑战。）

我之所以选择全球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作为我的主题，主要是因为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借用英语的隐喻来讲，我可以给自己戴上三顶“帽子”，也就是说，我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我担任过学院院长及公立大学系统的总校校长，我曾任职的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是个巨大的系统，拥有 64 个分校，学生人数达 40 万之多。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一名学者，长期从比较的视野研究国内、国际的大学财政和大学管理。从总校校长位置上卸任之后，我主要从事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现在担任着“高等教育财政”、“高等教育管理”和“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课程的教学，还承担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高等教育财政与大学入学国际比较”的研究项目。基于这些背景以及我多年来对世界各国大学的观察和研究，我准备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既谈问题和挑战，也谈对策和政策。

第三重身份是作为一名中国高等教育长期的观察者。我第一次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并就高等教育经济和财政问题作演讲是在 1981 年。我还记得我与我的朋友、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佛年先生作过的长谈。20 世纪 90 年代，我到过中国的一些地方参观和讲学，曾经几次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著名大学领导人与学者、北京大学的闵维方先生晤面。我现在的研究项目“学费与财政资助政策国际比较研究”的中国合作伙伴是，地处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并与该中心主任沈红教授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的合作项目包括将我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学生贷款制度研究，以及最近以华中科技大学为案例进行的成本分担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影响的研究。

一、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观察及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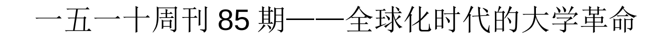
在世界高等教育都经历着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且积极实现其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是做得很“对”的。第一是注意保持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平衡——既有达到世界科研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又有功能明确、为地方服务的教学型大学，还有为满足公民教育、个人发展和中国经济巨大变化等需要服务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是中国认识到科学研究前沿是无国界的，中国大学必须也有能力与世界顶尖大学开展竞争和合作。中国将这么多的年轻学者（有些也不是很年轻）送到国外留学深造、中国对电信行业的巨额投资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地大学的广泛接触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是给大学及其它高等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给地方下放更多的权力。因为人们认识到，不管中央各部门是多么的明智和有远见，要想直接管理好 200 个甚至更多的像大学一样复杂而多样的机构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较早地认识到进行适当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必要性和合适性，让家长甚至学生自己承担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和质的改进过程中的一部分成本，这对一个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尤为难得。





第五与第四点紧密相关，那就是中国认识到，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不决，必须建立基于需求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设立可行的学生贷款项目，以便让学生为自己接受的高等教育进行投资，而不仅仅是依靠父母。

第六，也就是我所列举的最后一点（当然我必须承认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难免有武断的性质），我个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大学、学者以及领导都认识到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必要性，也意识到我的两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和比较教育——是规范和正式的研究领域，并且还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

二、全球大学变革

我的主题是全球大学变革，至于“大学变革”，不单是指大学本身的变化，而是指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的变化，如领导者的行为的变化，当然最主要的是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行为的变化，他们的行为共同给大学以定义、共同决定着大学的特点。大学作为组织，可以发展、合并、分离、增加新的专业、建设新的楼房、改变其财务报告制度，甚至还可以改名——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变革！而如果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讲授新的课程、或与学生和社区建立了新的关系、或从事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如果学生有了新的选择、或承担了新的责任、或改变了学习方法；如果大学的管理人员有权力做出新的决定、或者按一套新的规则运作，并且这套新的规则会影响资助什么和不资助什么、解聘谁、奖励谁等方面的决定；那么大学才是真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对全球大学变革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预设。我要报告的是我认为我了解的东西，但这不可避免地是通过我——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前大学校长、一个长期讲授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并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写作的学者的视角来看的。很难将我所见的与我所想见的区分开来，也很难将我所见的与我认为我国和其它国家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所应该做的区分开来。那些“改革议程”报告往往都只是报告人的“个人愿望”。

最后，让我感兴趣的，至少在本章中感兴趣的，是那些有目的的、也很棘手的、并且能引起高等学校领导、国家以及高等教育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的变革。由各派力量包括政府部



门、政党、董事会、校长、教授评议会或其它利益相关者共同所作的任何决策，本来都可以有其它选择。决策是有机会成本的，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决策的机会成本就是指，由于没有采取其它决策所导致的利益损失。变革既不是由火灾、地震或政府预算的大量缩减等灾难引起的，也不是由一些意外的幸运事件（如获得意外的捐赠、学生利益得到改善等）引起的，而是出自深思熟虑的决定。当然这些决定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能做出决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大学变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已经将它定义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但我在这里只想提三个问题，并对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第一，全球的大学在变革中有哪些共性、哪些趋同的方面、哪些共同的主题？

第二，引起变革、尤其是引起那些带有共性的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大学和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政府和大学的应对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换句话说：政府或公众的利益与大学的利益究竟是趋同的还是相互背离的？为什么？这里暂且不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是政府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政党、被选出的官员，还是学生和家长这个集体；也暂且不管大学利益的代表者究竟是大学校长、教师，还是董事会。

（一）全球大学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

或许在座的每一位都已经注意到了下面这一系列的变化，甚至还参与了这些变革。这些变革可能出现在中国，也可能出现在有幸来参加这次论坛的其他代表的祖国。我将列举如下 12 个方面的变化，我的列举不一定很全面，因为这只是我的研究，我承认其中有些是我认为应该进行的变革，还有一些只是我个人所观察到的。

1. 高等教育参与的扩大。欧洲人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马丁·特罗大约 30 年前就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其根源在于使人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的理想民主化。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是促进市民社会良好运行的一个发动机，它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和商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更好地发展。

2. 高等教育或中等后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在座的各位中许多都是世界最知名的大学的领导，我会非常敬重你们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全球高等教育的变化中很多都与非大学形式的高等教育或中等后教育机构的设立、扩张及质量的改进相关，这些机构通常提供短期教育、并且职业性和实用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虽然过去许多国家将大学和非大学截然分开，被称之为“双轨制，但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这种“双轨制”，或者至少可以说，原来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了。事实上，当前也确实存在着与多样化相反的趋势，即大学漂移（university drift），也就是许多高等学校竭力仿效名牌大学的办学模式，以获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和更多的学术选择。但高等院校多样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恰当的，因为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有些主要是为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服务，还有些是以知识的创造和科学探究为首要使命的。

3. 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关于技术对大学的影响，人们有过很多的预测和论断，我认为其中有些过于夸张和幼稚。虽然我认为，技术并不会完全改变大学生一起到教室来上课，并由专职教师（即教授）现场授课的“旧模式”，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大学，但技术对大学确实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将继续改变我们所从事的学术职业的方式，削弱传统大学的主导地位。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已经使学术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已经开始深入地影响教与学。

4. 大学第一学位的合理化。这种变化对欧洲大陆和那些一直恪守严格挑选生源原则的大学影响最大，这类大学在整个 20 世纪都始终坚持从经过了严格的学术性训练后的中学生中挑选生源，并且这些学生获得第一学位的时间都很长。根据由各国教育部、而不是大学校长签署的欧洲波隆那协定（Bologna Convention）及其它协定，欧洲的大学正逐渐将本科学制变成三年或四年，然后学生就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5. 本科课程模块化。与本科学位时间缩短和规范化相联系，将各专业或学科的课程“模块化”（modularization）或“打包”（packaging），将会极大地增加学生在大学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流动性。

6. 高等教育市场化。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影响主要有：对学生在择校、转学、退学、毕业等方面的决定的影响；雇主对所需人才的专业

和学位的要求的影响；基金会和慈善捐赠人对拟捐助的高等学校和专业的选择的影响（市场化的倾向明显受着上面提到的第 4 和第 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 7 种变化的影响，和下面第 11 点中所定义的“私有化”有一定的联系，但这两种变化还是相互独立的）。

7. 成本分担的增加。增加成本分担就是经费由过去全部或几乎全部由政府（纳税人）负担转向由家长和学生交纳一定的学杂费和（或）食宿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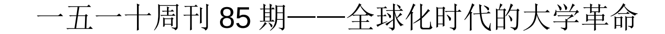
8. 学生财政资助的增加，资助形式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means-tested）发放的助学金和（或）学生贷款。经济资助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促进高等教育的参与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见第 1 点），而在将成本由政府和纳税人负担转向由学生和家长负担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见上面的第 7 点）。

9. 大学和教师的企业化行为。因为人们期望高等学校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做出更好的回应，同时又希望高等学校更少依赖政府的投入，所以也希望高等学校有一定的企业化行为：这就意味着高等学校也要推销自己，要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了解客户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10. 大学自治。因为人们期望大学更有效率，在经费上更少依赖政府（更有创业精神），而对学生、企业和整个社会的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回应，所以大学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而且人们也意识到，想通过遥远的、反应相对迟缓的、中央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来使大学完全实现这些使命根本就不可能。

11. 私有化。上面谈到的许多变革都与私有化有关。“私有化”这个词更多地是用来表示一种趋势和发展方向，而不是指一种绝对的状况。私有化的含义包括好几个不同的维度，如所有权、使命、经费来源、政府干预的限度、管理模式等。有时候，一所私立大学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入，并受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因此它根本就不是一所真正的私立学校。相反，如果某所大学已经清楚标明是公立或政府所有，就得完全服从于政府的权威，但根据政府的政策可以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按私有企业的规范运作，并主要靠非政府经费来办学，那么这所学校其实就是非常“私立”的了。我所界定的全球大学变革中的“私有化”，既指要鼓励设立私立大学，但更多地是指政府的或国家所有的、和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大学的这种“私有化”。





12. 董事会管理。由于认识到要加强大学自治，同时又要平衡校长、教师、学生和大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议会、立法部门或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社会利益的无可争辩的代表），许多国家都在吸收美国的董事会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大部分的管理权力都被赋予给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可以经过选举或任命产生，董事会享有决定高等学校发展的大政方针、任命校长的权力，同时将大学的运行管理权授予给校长。

（二）普遍存在的“大”问题

尽管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大学观察者所列举的问题会稍有不同，但我估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注意到上述这些变化，或者至少说是趋势。然而，更有意思的应该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或者说是第二大挑战，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或挑战呢？为什么会有这些趋同的变革呢？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也许会表现出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和高等教育财政学者的偏好。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明显地看到一个世界范围的变化趋势，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努力回应三个同样的大问题——而它们恰好都主要是财政方面的问题。即：

财政困境。在工业化程度不太高的国家里，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处在严重的财政困境之中，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里，大部分的高等学校好像也总是处在困境的边缘。而从某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范围来看，这种困境更加引人关注。从根本上说，大学开支增长曲线是超过其收入增长曲线的，而增设新校和扩大招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条件急剧恶化。

效率低下。不管面临怎样的财政紧缩，也不管收入是如何的不足，我们都有必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做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利用我们可能得到的收入实现产出或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大学而言，效率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但不管它是什么，它都是极其难以达到的，也许试图达到效率最大化的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不平等。要求我们的大学，或是别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去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减少不平等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至少这些机构应该尽量去减少那些由于出身、社会阶层、性别、语言、种族和家庭所在地的不同而引起的在富有程度、收入、社会地位、成功机会和政治权力等方



面的不平等。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是个体改变其出生状况、提升其社会地位的有力载体。但事实是，从统计角度来说，几乎在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大学的入学机会和学业成功与一个人的家庭出生状况都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大学极有可能会保持、甚至是加速诸如收入、社会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这些不平等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

虽说我重点讨论的主要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我并不否认在课程、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质量改进的问题不重要。事实上，没有什么问题比恰当的课程体系更重要（除非它只是涉及到课程教学和学习的方式）。但是，我们主要想强调的是教什么，怎样教得最好，这样说可能会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也许还会冒犯在座的已经厌倦了经济学家罗嗦的各位。如果发现我们的表述不准确，那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需要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缺乏资源，或是不能对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或是因为我们无法扩大规模将所有应该受到教育的人吸收进来，或是因为我们没法做到足够公平，因而我们尤其应该重新矫正经济的不公平问题，因为经济中的公平与否决定着教育机会的有无。需求并不总是与经济相关的，但我可以肯定，出现的问题则主要是与经济相关。

1．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财政困境与经济的生存能力

我们先来看看全世界都面临着的高等教育财政困境。在所有国家，即使是最富足的国家，高等教育经济生存能力不稳定的核心原因是收入和支出曲线的自然背离（特别是当高等教育收入以公共经费或税收为主时，情形更是如此）。对于财政困境的形成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考查就自然而然地导入了我的第三个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引起了高等学校和政府间的利益差异？引起了他们对财政困境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法上的不同呢？从理论上说，高等学校的财政是可以健康运行的，也就是说，它们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它们的开支，至少是某些特定使命的开支。而政府，或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或是社会则有可能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因为它们往往没有能力去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需求，去满足创办更多大学所导致的经济的、公民的需求。这是解释高等学校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分歧的很好的例证，这些分歧虽然只是偶尔出现，但却是值得重视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深入一点考虑，就可以注意到“高等学校内部”在利益上的重要差异，比如校长之间、学院院长之间 、教师之间、

或是教师和其他人员之间、甚至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利益差异。同样，“政府内部”，如不同的部委之间、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利益差异。

（1）高等学校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高等学校，理所当然地需要使其单位成本或是生均成本增长速度不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成本增长适当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收入的可获得情况，在相对贫困的国家，生均成本的增长率通常不会追赶或超过通货膨胀率。就面临的压力，即成本变化的驱动因素而言，各处的情形几乎都一样。引起成本变化的因素通常包括 3 个方面：第一，提高工资待遇。这主要出现在整个大范围的经济得到了真正的增长，增长速度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尤其是当教师的工资增长要“赶上”整个社会工资增长水平时；第二，开设新专业。这通常都会增加成本，而原有的费用就算是有可能，也不能足够快地被“周转和分配”过来；第三，改进质量。造成质量改进的压力的因素并不主要是那些期望得到更优质的教育并乐意为此付费的消费者——学生和家长，甚至也不是那些接受者、或是潜在的雇主和用人单位，而是教育生产者或提供者本身，尤其是那些期望拥有更多计算机、学术期刊、研究设备和研究时间等条件的教师们。这在技术领域更是如此，因为在商品生产的经济中，技术有利于“减少成本”、“增加产量”，否则就不会有人购买技术产品了。但在教育中，技术主要会导致成本的增加，最终也许可以、但却并不一定能够增加可观的产出来抵消成本的增加。

因此，当高等教育的生产性投入（如教授、技术、能量等）的成本比其他生产的成本和价格增长得更快（也就是说，高于通货膨胀率）时，这种成本的增长趋势就无法由增加产出来抵消，生均成本的增长速度也会高于通货膨胀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成本病”，或者是非生产性部门，包括高等教育部门的成本相对上涨的现象。[1]

在美国，成本和学费的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们似乎并不关注学费的绝对水平，甚至也不关注生均成本的水平，然而当费用的增长、尤其是学费的增长高于通货膨胀率时，他们就会十分关注。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通货膨胀率只是许多种价格上涨的加权平均数，因而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在考查到的所有价格因素中，几乎有一半的价格因素会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个平均数，而只有一半会低于这个平均数！

财政困境事实上是由于成本和收益曲线相背离而引起的。如果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拥有巨额预算资金和巨额资产的大学里，也常常会出现关闭某些并不是不可行的专业项目、裁减终身教授人数等做法。实际上，某个时期的收入情况、资产和财富的总量情况等其实都无关紧要（也许我有点夸大其词），重要的是收入转化为费用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尤其是转化为大学管理部门也无法控制的费用的速度有多快。比如，在大多数中国大学校长们看来，纽约州立大学（SUNY）是比较富有的，但作为该大学的总校校长，我也确实经历过在不到 6 年时间里被削减掉 2 亿美元的财政困境，因此我们被迫痛苦地（对我是如此，对其他相关的人无疑更是如此）裁减一些终身教授、并且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明显降低我们质量的措施。因为成本曲线是由州长们拨给教授和员工的工资和待遇增长情况决定的，但在当时，大学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因为州长和州立法部门拒绝支付这部分增长的费用、拒绝提高学费，而且仍然依据非常严格的计算方式进行预算拨款。这是我们所预料到了的、并且也是必须执行的。

（2）国家、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国家或政府不仅面临着高等学校生均成本上涨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学生入学需求不断增长（这种需求的增长当然也利于整个国家）带来的成本增长压力。这种成本压力的加大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以下条件驱动的：第一，人口的增长（在中国相对慢一些，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是非常快）；第二，中学毕业生数量的更快增长，因为条件的改善使广大的农村也提供了中等教育（这在中国和别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第三，想接受高等教育和应该有权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比例的增长。这些有关高等教育容纳能力的压力，在一些国家非常明显，比如中国，某些国家目前刚好处在高等教育入学增长曲线的最陡峭阶段。

这些加速成本上涨的因素（中学毕业生人数的增长、中学毕业生中要求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的上升等）推动了高等学校不断上涨的生均成本进一步上涨，这就需要政府去解决理论上“双倍快速增涨”的成本曲线问题，即使可以用私人财富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3）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力

既然办好大学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对大学的投入，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也明白，要办更多的大学来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且生均成本是不断增长的，那么政府怎么可以使其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以满足这些需要呢？不幸的是，收入的自然增长曲线、尤其是靠公共收入为主的增

长往往要缓慢得多。所有国家的公共财政收入通常来自于 6 个方面（这 6 个方面的比例在各国是有差别的）：

• 直接税收，比如销售税、所得税、资产税以及特种商品销售税等。

• 间接税收，即对企业征收的利润税和增值税，当然这也会转嫁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最终性质也和销售税相似（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中，对国有企业的征税不再可行，很多其他形式的税收又经常遭到抵制，因此这些间接税经常被转到通过一些商品或服务来征收，比如燃油税、农业税、能源税、电话使用税、金融交易税以及那些很难躲过当局的进口关税）。

• 变卖国有资产（比如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

• 政府对所提供的特定服务收取费用。

• 从储户手中借款（这将会挤占用于其它生产性投资的经费，而且这些必须偿还）。

• 过度发行货币（这不用依靠储户，而是依靠通过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来掠夺人们的购买力，这对储户、对那些依靠固定收入的人们、对整个经济以及国家的信用水平来说都是一种风险）。

所有这些传统的筹集公共资金的方法都是很有限的，对于那些工业欠发达的国家，或是那些“转型”国家尤其如此。使收入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在每个国家—— 这里又要特别提到那些工业欠发达的国家，或是那些“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人们对公共资金的竞争日益激烈，以下的各项都需要从公共资金中开支：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公用设施、道路、电信）、住房条件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对老年人、儿童和其他没有谋生能力的人提供资助的社会福利等。

有两条结论正在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尽管人们接受时不太乐意且带有几分伤感：首先，通过税收、借贷或印刷发行货币等形式筹集财政资源的做法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即使国家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税收（或者能够确保公共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在分配这些稀缺的公共资金时，政府也不再会考虑把大学作为优先投入的重点。因此，不管公众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多么有信心，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获得充足的资

金来解决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尤其是当显著地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时，情形更是如此，比如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状况。

（4）解决办法一：降低成本以减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

减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的一个有效方法当然是降低成本，这正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要求它们的大学（至少是公立大学）去做的，或是要求它们做得更好的（这让我想起了纽约州立大学削减 2 亿美元的故事）。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很有讽刺性，因为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论怎样降低成本，并不会减少政治家们所钟爱的或喜欢的任何专业项目，不会缩小招生的规模，不会关闭任何在政治意义上受欢迎的校园，或是实质性地裁减掉任何人员。实际上，当高等学校面临财政困境时，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大多数校长们认为他们已经、而且早就已经开始努力地、明显地降低成本了（只不过是“成果不显著”）。当然，我们总能找到优先权最低的活动和项目----不管它们究竟会有多么重要----去考虑关闭，这是另外一种潜在的降低成本，正如企业中总有某人某事会比其他的人和其他的事效率低下一样。许多大学也许已经非常接近（或是已经超过）经费削减的极限了，这里的极限指的是还不至于危及大学的使命和质量的限度。

（5）解决办法二：寻求非政府经费投入

另外一个也正在逐渐被全世界所接受的结论是，对于大学本身和所有希望得到大学教育的潜在的大学生们来说，高等教育的财政生存能力需要非政府资金，即非税收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只有来自于以下的几个方面：

- 学杂费；
- 对由大学或政府提供的食宿按全成本或接近全成本收费；
- 通过开设特别课程、开展资助研究和合同研究的方式，有偿提供教师的时间和专业技术（包括出售和租赁大学的资产，如大学的声誉和设施）；
- 慈善机构、校友、朋友、公司或基金会提供的捐赠。

在这些形式中，最具有活力的——然而从政治的角度上讲，又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当然是收取学费，或是成本分担。[2]我们可考查一下过去十年中成本分担所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中国，所有大学都一度是“免费的”。更确切地说，上大学的费用是由政府通过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承担的。但是自从 1997 年以来，这种费用中的一部分是通过收取学费由学生家长承担的，另一部分则越来越多地由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来承担，虽然这一部分的比例还很小。

在美国，私立大学每年的学杂费可能超过 35, 000 美元，而在公立大学，仅学费一项开支也在 4, 000－6, 000 美元之间，另外还得加上 8, 000－10, 000 美元作为学生的食宿和其他生活费用。

在欧洲，虽然欧洲国家相对要富足一些，传统的大学教育是免费的，但是面临学生和政治左派的强烈反对、面临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限制，荷兰、葡萄牙、英国（1998）以及奥地利（2001）等也相继迈开了实行成本分担、收取学费的第一步。

在俄罗斯和大部分的前苏联国家，在东欧和中欧的许多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仍然被看成是一种特权，而且依法规定大学教育是免费的，但它们大学的全部收入中仍然有 25－30％来自于学费！其诀窍在于，限制有资格接受免费高等教育的人数，只是那些通过了严格的大学入学考试、获得了最高分数、第一次进入大学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学生才能免费。而参与“公平游戏”中的其他人就得自己交学费，不管他们的成绩、潜力或财政需求如何。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正如中国一样，许多国家实行的都是完全国营的和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生产和资源分配形式，高等教育也被认为是一种特权。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根本不再有能力征收到税款来支付教育经费，大学开始变得越来越破落，那些通过了入学考试、得到了足够高的分数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其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相对富有的城市家庭（他们的食宿费、甚至直到最近他们的零花钱也由国家支付）。2002 年年初召开的有 10 个东非和南非国家参加的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讨论成本分担的必要性和公平性——虽然这在政治上要冒一点风险。[3] 比如，为了更好地应对过去一、二十年里给很多非洲大学造成惨重破坏的财政困境，乌干达的马克里尔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正在积极地推行“双轨制”，即接受免费大学教育的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录取学生总数的 20%，而其他学生则必须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自愿地）付费。

再回头来看看中国的情形。在 1997 年，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种模式的潜在的不公平性，甚至是潜在的腐败性，于是打破了这种模式，并开始尝试向所有学生征收小额学费，官方的材

料解释说，大学教育能够带来很大的个人收益，所以家长和学生应该乐于支付这种学习费用。

在全世界来看，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的许多国家（比如巴西、菲律宾、日本和韩国），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学费的私立高等学校开始出现了，这些私立高等学校都是经过政府批准和鼓励建立的，有些甚至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因而我们也能注意到支持高等教育财政责任的转移趋势，即从政府和纳税人转向家长和学生。

2. 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二：效率低下

（1）效率与资源配置

全世界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效率低下，简言之就是“把可用的经费用在不恰当的地方”。财政困境是大学不能获得与其规模和使命相匹配的充足的收入，效率低下则是指对可能获得的各种收入的错误分配。显然这两种情况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比如，如果能部分地解决财政困境的问题，那么也就能相应地提高效率。

传统的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的检验标准是，当资源被分配以后，没有任何的其他重新分配的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说，高等学校不能通过在不同的学院和系中重新分配预算资金、在教学、设备维修和管理等方面重新分配资金而“做得更好”；院长不能通过在各系间重新分配预算资金、系主任也没法通过在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重新分配预算资金而“工作得更好”。

因此，效率低下完全是与资源配置相关的，并且行政意义和管理意义上的提高效率也都是与资源重新配置相关的。由于在大学中被认为是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主要是人，即教师和员工，因此，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的一些管理行为都经常遇到来自人的很大的阻力，比如：

• 人力资源转移——某个系或专业有教师离职了，领导聘用新的人员来接替他们的职务；

• 教职员工人力资源调整——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新的培训，而更为困难的任务是要求这些教职员工很快养成新的行为习惯、适应新的行为方式；

• 通过解聘或是鼓励生产能力已经下降的人员退休而创造更多的聘用机会（有时解聘也并不是因为被解聘者本身有过错，而是因为对他们的要求有了改变，从而使他们过去所接受的培训不再适用）；

• 将过去用来支付人力资源的经费转用于设备更新、购买新的设施或者用于设备保养。

在任何组织中做出这些决定都是很难的。在大学里则会更难，因为大学里的资源最优配置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大家普遍认可、有技术规范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种学术判断。学术判断历来都是充满争议的。教师们以及院长们（正如大家所知）都很善于争辩，善于抵制变化，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所做一切都是重要的、高尚的，他们还会认为所有新的标准都是无关的、甚至是不高尚的（比如“市场需求”这一标准就很容易引起这些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关于配置和重新配置资源的决定，经常使人们感到失望和受威胁，因而，在大学这种珍视谨慎行事和达成一致意见的组织中特别难以贯彻，因为最终的决策者，即校长、学院院长和系主任等虽然说不上是完全由选举产生的,但主要是由选举产生的，当时的投票者本来是希望被选人员能给他们以回报的，而现在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这些强硬政策的最委屈的受害者。

各地大学都具有的这些特点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释全世界大学、尤其是那些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所面临着的相互交错的财政困境和效率低下问题。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解决财政困境的一种方法就是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另一种不同的方法就是提高效率。由于提高效率的做法存在着行政上的执行难度，同时也容易给个人造成伤害和痛苦，在高等学校更是这样。因此，一所资金不足的大学的校长（在我们当中，谁会否认自己所在的大学资金不足呢？），最要紧的做法就是尽力通过开辟新的收入渠道来缓解财政困境，至少要去思考扩大收入来源的办法。这样，我们首先就要去和中央部委谈判：即让议会和立法机构把我们当作“特例”，用不同于对待其它兄弟院校的特别方式来对待我们学校；或者，也可以期待慈善机构为我们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同时还可以要求增加学费，以作为艰难的资源重新配置手段的替换方法；也可以减少开支，但这经常意味着要裁减教师和员工。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如果通过降低成本或裁员的方法就能很快地解决收入不足问题的话，也就证实了政府一直以来就对大学持有的那种怀疑和偏见：大学是低效率的。

另一方面，所有国家的政府，由于某些好的理由，尤其是政治上的便利，很容易给一些大学以效率低下的“罪名”。因此，政府领导人就很有理由拒绝对大学增加投入，他们会认为，如果大学能够提高效率的话，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投入了（领导们甚至还经常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大学提高学费，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学费上涨是不受欢迎的）。就算不从政治角度来谈预算问题，因为预算问题从来都是不好考查的，政府领导和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们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并非不理智的、相反还比较令人信服的、甚至是仁慈的出发点，因为校长们需要政府的参与来使这些艰难的、但也是必要的决定得以做出。如当政府提供的资金明显不足时，校长们和其他的学术管理人员就被迫要做出一些原本就应由他们自己（校长和系主任们）做出的艰难的决定，当然在正常的学校决策过程中，政府的意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也是多数校长在各位副校长和学院院长身上玩的一个“小花招”，即通过削减经费，强迫副校长和院长们放弃一些低优先权的活动以及低优先权的教师和员工，从而使他们能腾出经费来从事一些具有高优先地位的活动。

（2）效率与与大学自治

即使我们承认大学领导人有时需要政府的鞭策才会放弃那些低优先权的事情，但是真正要决定该削减什么，要增加什么，要中止什么时，最好由大学自己而不是由政府部门作决定，这是普通的管理智慧，至少从私立大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在以私有化和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中，人们认为，只有大学自治才能使效益最大化。人们通常还认为，政府、尤其是集权政府总是远离实际情况，因而不会了解不同资源配置决策所带来的全成本和预知收益。最理想的选择是，尽可能让真正的第一线人员去决策。

就拿“成本分担”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把大学经费预算的权力交给大学，也就是说，增强大学自治，是全球大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强大学自治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

• 增加大学经费（不管经费是怎样获得的）开支的自由，允许大学根据实际情况将经费用于不同的用途，比如，允许大学将裁减教职工所节余的工资用于购买设备或其它用途，反之亦然。

• 有权力自主决定缩减甚至完全取消某类专业或某些活动，包括裁减对高等学校没有多大价值的员工，以积聚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当然这要在遵守劳动合同和雇佣惯例的前提下来实施。

• 有权力自主聘用教职工并根据大学的使命来决定聘用条件，这就意味着可以按劳动力市场行情来采取差别工资策略（而不是像传统大学那样采用大致相同“水平”的工资），或者按需要而不是按公务员条例来聘任教职工。

• 有权力自主签订合同、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负债（比如为改善条件和设施、改善资本运营状态而进行必要的投资和建设）。

• 不仅有权力支配“节余经费”，而且可将它们带入下一年度和将累积的节余用于投资，而不用担心会被政府官员认为这所大学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也不用担心政府官员会将这些节余经费用于其他的公共事业。

另一方面，高等学校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我在前面的问题中也谈到了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利益背离。大学校长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很敏感，他们的行为也会非常得体，校长们要在经费不足、学术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来协调大学的多重使命。因而，不论公共利益有多大或有多么重要，也不能期望由大学校长们也来考虑大学的社会责任。应该由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政府来使大家明白，大学的某些活动可以带来公共利益或社会效益，如提高农村或少数民族或其它弱势群体的入学率；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或给社会带来经济价值的“外溢效应”等，这些都不能指望校长们尤其是不能指望院长们和系主任们在做出决策的同时就考虑到这些重要的效益。在上述情形中，真正的优化可能需要政府的干预：对某些项目进行补贴以降低明显的成本、或对大学的自主资源配置权作一定的限制，以期实现大学资源的社会优化配置。

3. 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三：不平等与扩展入学的目标

高等教育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不平等，这也是大学教育所面临的一种挑战，因为人们期望高等教育能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大学必须努力降低大学参与、学业成功与父母收入、父母教育程度、性别、语言、种族、居住地及其它与生俱来的条件之间的相关性。如果高等教育参与和这些特征紧密相联，就会让那些与生俱来的条件优势长久地产生影响，甚至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财政的全球变化趋势与高等教育参与（即入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成本分担，尤其是过去由纳税人负担的教育经费转向由家长和学生分担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明显地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农村和少数民族家庭学生参与高等教育，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钱，而且还有不愿借钱的文化传统，即使经济回报可能会很可观，他们也不愿意去筹借款项来做必要的投入。这也就是实行成本分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的原因，这些措施包括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向贫困生提供助学金、向贫困生提供申请手续简便的学生贷款等。政府和大学也要加强宣传，要让学生在中学阶段就知道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对他们很有意义，并且他们也能够申请得到。

进行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ing）很困难，也很费钱，在缺乏有关家庭收入和财产登记的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而且这种缺乏在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经济转型国家是很常见的。其中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家庭付费能力”的替代性指标，这些国家不像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技术先进国家那样，有很容易获得的、可信的、有关收入的资料，并依此来决定个人所得税和缴纳养老保险。但无论如何，真正既公平又成本有效的办法几乎还没有找到。另外，既能促进大学参与又能让放贷机构（银行或政府）赢利的学生贷款现在还很少见。高等教育财政的国际比较领域（这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中随处可见的是众多学生贷款失败的案例。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正在完善学生贷款，以更好地实现两项看来似乎有点矛盾的目标：第一，让青年人借贷，以使他们能够上得起大学，否则就不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这种学生贷款意味着学生可以借款而无须家长签名担保）；第二，真正建立一个完善的贷款回收网络，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扩张。

因此，财政困境、效益低下以及不平等这三大挑战似乎是全球大学变革中的核心问题。全球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不仅要应对大学组织结构难以改变的挑战，还要面对变革所遇到的两难问题的挑战。例如：

- 要通过成本分担来补充政府经费的不足；又可能会不利于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

- 为了化解政府投入不足的危机，鼓励教师从事一些赢利性活动；又可能使他们偏离大学的核心使命（教学和科学探究），使教师疏于专业活动。

- 想让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又不想增加更多的政府投入，也不想使大学人满为患、质量下降。

• 通过增加“非大学”形式的机构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可以增加青年的入学机会，并为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中学后教育；但又易于使他们进入收费低廉、声誉不佳的学校。

• 将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或地方董事会可以使地方有更大的权力；但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及微观管理的失控。

• 高等教育财政向着政府“总付式（lump sum）”预算方向改革，增加大学最大限度地重新分配资源的经费使用权；但又会发现大学校长、院长和教师在使用经费时，其优先考虑会与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 学生贷款面向全体学生，尤其在贷款不需要家长担保且利率优惠时，可能有助于学生自我投资于高等教育，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但又可能会导致很高的拖欠率，很低的回收率，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缩小贷款规模甚至停止学生贷款。

全球大学变革是很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同时也是很复杂的，对此我们需要警醒、清晰判断和注意平衡。最重要的是，全球的大学变革不仅需要大学校长、教师、学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关注，由高等学校、校长、教师组成的一方与由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组成的另一方之间的利益平衡，最终还是必须通过这些变革来实现。

三、关于中国大学的未来的思考

在本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冒昧地对处于全球大学变革背景下的中国大学的未来提出我个人的思考。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 6 大特别的挑战：这 6 大挑战有的主要针对中国教育部，有的针对省级政府和部门，有的针对共产党，有的针对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我没有按什么特别的顺序，它们是：

1. 继续进行以及“深化或完成”大学合并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本来就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所以一直以来就和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为国家服务的——也就是为国有的、由中央集中控制的经济和军队服务的。很多大

学和其它层次的高等学校不是归属教育部，而是归属中央的其它部委，主要为他们的一些特殊岗位培养人才，学生也必须服从分配。这些高等学校中虽然不乏学术声誉良好的大学，但大部分都规模很小、高度专门化、主要为国有的和集中控制的经济服务。自中国经济建设实现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渴望寻求的不再是一份国营单位的工作，而是更多的机会，因此，原来那些专业覆盖面狭窄、高度专门化的大学就显得越来越低效、也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了。针对这些情况，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将两所或更多的大学合并起来，以求得更大的规模效益，也使学校提供的课程更为多样化、更有吸引力。

然而，要实现真正的合并是很有难度的，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结果，合并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只是合并前的各院校换了新的校长或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合并起来的院校换了一个共同的校名，但是他们中大部分都还各自保留着原来的教职员工队伍、设备设施、专业项目和课程等。中国也根据实际情况合并了很多高等学校，初衷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实现由规模扩大和学科专业覆盖面增大而带来的其它优势。但是，合并也还需要“消化和深化”的过程——最终使合并不仅仅是两所学校并到一起，而是一所新的、面向未来的学校的产生，这所新学校只是将原来各校的精华部分保留下来。

2．协调好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所属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在获取资源、获得政府关注等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但是，是不是教育部所属的这 71 所高等学校就一定会有更好的财政状况、更高的学术选择性和更好的声望呢？事实上，地方高等学校、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富裕省份的高等学校中，有一些已经凭借当地的资源优势实现了繁荣和发展，它们的生源很有选择性，它们在为当地乃至其它地区的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必要鼓励它们去争取成为教育部所属高等学校吗？它们能够指望成为教育部管理和资助的高等学校吗？让所有的高等学校在同样一个水平上去竞争资源的做法合适吗？是不是这种竞争最终会导致不恰当的“大学漂移”，使高等学校都竭力朝着研究型大学的方面发展，使那些本来可以在教学、应用研究和地方服务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的学校失去其优势呢？

社会一直面临着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压力，一个相关的问题就因此而出现了。机会均等的主要目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补偿，因为有的人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或是偏僻的地区，他们的母语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可避免地要受一些

影响和限制。那么，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是单纯地由地方高等学校来承担，还是应该让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一起来承担呢？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也未能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保持高等学校之间的差距和多样性是很重要的，实施“211 工程”、使一定数量的高等学校获得资源向世界知名大学的学术水准迈进也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问题依然存在：是不是这些大学就应该一直享有这样的优待呢？其它大学是否还有机会挤入这一行列呢？因为凭借地方的资源优势、自身的刻苦努力以及好的发展机遇，有些大学的发展势头是现在所无法预知的。另外，学校的学术选择性是否要与教育部的隶属关系相匹配，换句话说，是不是隶属教育部的学校就一定具有高的学术选择性呢？

3. 更加坦率地承认这样一种自然趋势：任何地方的大学都会保持、甚至扩大出生背景引起的不平等

出生背景主要包括性别、种族、母语、教育背景、职业、父母的收入状况等因素。实现真正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就必须更加关注中学、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中学的质量。录取的标准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学习潜力，而不是单纯凭借一次考试的结果，不管考试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考试多么科学，都不足以作为唯一的凭据。中国高等教育中，成本分担的比例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参与面也越来越广，这就要求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的资助项目更加有效，学生贷款项目更加可行。在评价大学为此所做的努力是否成功时，人们所使用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少数贫困、但是聪明的农村孩子对自己的学业成绩的满意程度，而是许多同样贫困、但学习能力平平的农村孩子对自己的学业成绩的满意程度。

4. 剥离“大学城”里的非学术部分

中国大学的一个明显的发展方向就是在逐步卸掉以前的一些经营和管理责任。过去，大学就是一个完备的小社区，要对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负责——比如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等。显然，大学在提供生活服务方面的能力很难超越其它的政府机构或私营企业。现在，中国大学的教职员工也已经开始象工商企业的职工一样，到校园外面寻找住所。而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机构，不管是公立还是私营，在提供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时，往往做得比大学更有效、更出色。我猜想，中国的大学校长一定会欢迎

这样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他们所要考虑的“所有事情”，就是学生、教职员工、教学项目、学生住宿设施以及研究机构。

5. 接受并且加速教授和学生们越来越快的流动性

过去，近亲繁殖（inbreeding）是中国很多大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既不利于大学，也不利于学生，更不利于教授的成长和发展。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人才流动性似乎突然就加大了。流动性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不稳定性，但是稳定本身就是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的。事实上，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大学而言，在寻找更为适合自己的东西时，不妨好好地利用一下这种不稳定性，比如大学可以利用不稳定性找到更好的生源、更好的师资，设立更好的院系；而学生也可以利用不稳定性找到更好的学校。中国大学已经开始为他们最好的学生能到别处去进一步学习和就职于学术岗位而感到自豪了。

6. 对于很有学术潜力的中学毕业生来说，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不再是他们的唯一去处，而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

过去，那些最有学术潜力的中学毕业生往往就注定要终身从事学术研究。而其他的大多数学生也许就要注定去从事一些公共服务活动，技术工作或经商。对于杰出的本科生的经历而言，这些职业生涯体验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只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顶尖学者在一起才能体会得到的。所有的现代化国家，包括中国，都需要有研究型大学，以便优秀的学者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学术研究活动能获得必要的时间和资源的支持。然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很稀少、而且成本高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充足的财力来为所有具有学术潜力的优秀中学毕业生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中提供一席之地。因此，需要有也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教学和职前准备的其它替代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学生可以转学到他们期望去的并且值得去的、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提供的高级训练的学校去。

有一条好消息，中国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都有很高的能力。也有一条坏消息，中国那些有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还不能为这些学生提供足够的空间。然而，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如果高等教育系统内有足够的流动性，能允许真正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在获得学士学位以后再到那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继续学习，那么上述的坏消息中谈及的问题将不再是个问题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共只思考了这 6 个问题。它们和整个世界的大学变革是相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好像也是中国大学正在前进的方向。虽然前进的道路不一定平坦，但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注释：

1. 这是由威廉 J. 鲍（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 G. 鲍恩（William G. Bowen）首次提出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参见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in Performing Arts：The Economic Dilemma. 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6. See also William G. Bowen, The Economics of Major Public Universities. Berkeley：Carnegie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1968. For a more recent recapitulation, see D. Bruce Johnstone, "Those 'Out of Control' Costs," in Philip G. Altbach, D. Bruce Johnstone, and Patricia J. Gumport, eds., The Enduring Legacy：In Defen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Universit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Johnstone, D. Bruce and Preeti Shroff-Mehta（2000）."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and accessibility：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uitio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policies" and other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and Accessibility Project, Center for Comparative and Global Education, University at Buffalo 〈www. gse. buffalo. edu/org/IntHigherEdFinance〉.

3. 《东部和南部非洲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多元化和入学机会的扩充》(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Diversifying Revenue and Expanding Accessibility)，这是提交给由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高等教育财政和入学的国际比较项目联合承办的邀请会的报告。该会议于 2002 年 3 月 24-28 日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该报告可以通过以下的网站查阅：〈www. gse. buffalo. edu/org/IntHigherEdFinance〉.

（D. Bruce Johnstone，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p=8242）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毕节 5 名儿童死亡事件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贵州毕节市**有 5 名流浪儿童，因天冷避寒，躲进路边的垃圾箱，却被闷死。这一情况被媒体证实，儿童们死亡的地点距离毕节市七星关区留仓桥办事处仅有 20 来米。警方表示这些儿童的年龄都在 10 岁左右。

新闻：http://fmn.cc/SVEhDf

随后**毕节市**通报证实，11 月 16 日，5 名男孩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公安部门目前已基本确定 3 名小孩身份，均为七星关区人，另外 2 名小孩身份尚在调查中。

新闻：http://fmn.cc/T5wXWs

毕节市后又查明，五名少年系当地三名同胞兄弟之子，他们之间既有兄弟关系，也有堂兄弟关系。他们的名字是：陶中井（男、12 岁）、陶中红（男、11 岁），父亲陶学元；陶冲（男、12 岁）、陶波（男、9 岁），父亲陶元武；陶中林（男、13 岁），父亲陶进友。居住地在均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距市区至少 25 公里路程。

新闻：http://fmn.cc/10iCYDE

有媒体的文章指出，**毕节市** 5 名男童闷死垃圾箱事件扰动中国的互联网，同时凸显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消除贫富分化问题的同时，5 名男童殒命垃圾箱的事件令中国告诉增长另一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新闻：http://fmn.cc/Q9gL93



毕节市 5 名儿童被避寒而死于垃圾箱一事持续引起社会关注，毕节市因此对 8 名官员进行免职等处罚，不过毕节方面表示，这起事故并非责任事故，而是“意外”。同时 5 名儿童家庭的照片被媒体曝光，他们住在逢雨便漏的土坯房里，其中家境最差的一间土坯房内只有 2 张空床和一张破烂的柜子，房间散发出恶臭，地上堆着生火做饭的砖块。网友还发消息称，最早曝光此事的网友“李元龙”，受到了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

新闻：http://fmn.cc/10spMw9
http://fmn.cc/SVE2bo

周口市平坟运动

自明年 1 月 1 日起，违规土葬、乱建坟墓将不再允许民政部门强制平坟。由于这一相对激烈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入土为安”殡葬观念和习俗相违背，近年来，**民政部**门强制平坟时屡屡引发公众反对。

新闻：http://fmn.cc/TIZgbE

今年以来，**河南周口市**的平坟运动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对，不过当局却决定进一步推进这一运动，还要求相关部门大力宣传。本月中国国务院发文要求明年禁止强制平坟，但没有制止周口市领导们的行动。18 日有多位媒体人在微博上表示，他们位于周口的祖坟被铲平，事件再度引发网民声援。

新闻：http://fmn.cc/RNOzXH

面对舆论的批评，早先对**周口**铲坟事件表态支持的《人民日报》也刊文称“河南周口被指面对汹汹舆情仍我行我素强制平坟”。指出政府不宜我行我素，温和、依法是处理平坟和传统丧葬文化矛盾的重要举措。

新闻：http://fmn.cc/UFnLY2

引起舆论关注后，有消息称**周口**市政府暂停了平坟的行动，不过这一说法呗官员否认，周口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胡朝阳表示，平坟“这项工作本身肯定是会继续下去的”。他称“下个月初我们会对前一段的平坟复耕以及公墓建设方面，搞一个验收，做得好的单位要

给予一定的奖励。绝对不会是网上一吵闹，这事就不干了，不会有这个（可能）。因为政府做了这个决定。”

新闻：http://fmn.cc/SVDZMH

白酒被曝含有塑化剂

媒体刊文称号称天下第一酒的**酒鬼酒**中共检测出 3 种塑化剂成分，分别为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酒鬼酒塑化剂超标 260%，今已临时停牌。

新闻：http://fmn.cc/S8GGvS

中国酒协 19 日晚发表声明称，“白酒产品中基本上都含有塑化剂成份，最高 2.32mg/kg，最低 0.495mg/kg，平均 0.537mg/kg。其中高档白酒含量较高，低挡白酒含量较低。”同时，酒协称去年 6 月就已经获知白酒普遍含有塑化剂，白酒中的塑化剂来自于生产设备。

新闻：http://fmn.cc/10iEDt4
http://fmn.cc/WsiBF5

根据质检总局网站的消息，湖南质检部门报告**酒鬼酒**确被检出塑化剂，最高检出值为 1.04mg/kg，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已经督促企业查明产出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因，认真进行整改。

新闻：http://fmn.cc/SVDVN8

本周法治新闻

中共十八大期间采取了极高的安保措施进行维稳，17 日北京网友**“星河舰队”**因在推特上的一条玩笑信息，已经被关押在看守所十余天，据悉他被刑拘的罪名是“散布虚假恐怖信息”。这则因言获罪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人们纷纷呼吁释放这名网友。

新闻：http://fmn.cc/S4JawJ



11 月 19 日下午浦志强律师在微博上表示，因网络发言被劳教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已经被从劳教所放出，该案 20 日将在重庆三中院宣判。去年任建宇被指控在微博和博客复制、转发、评点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判 2 年劳教。

新闻：http://fmn.cc/SI2QDv

20 日下午，重庆三中院以超过时效期为由驳回了**任建宇**的诉讼请求，任建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劳教并非教训，而是经历，据悉在劳教所尽管唱红歌是可以减刑的，但他从不唱。对于那件被劳教委作为证物的“不自由，勿（毋）宁死”的 T 恤衫，任建宇称，“自由需要争取，每个人对自身正当权利的坚守，才能令社会更加自由。”

新闻：http://fmn.cc/USi5zX

http://fmn.cc/SVDS3H

广东阳江一网民因发帖反对政府推行年票制被拘留，据悉该网友网上发帖、散发传单、鼓动车主兜风以反对阳江市推行年票制的行为被控“涉嫌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且不听劝阻”，因而被治安拘留 13 日。

新闻：http://fmn.cc/10iIxSv

11 月 19 日，**云南彝良**一名村民被行政拘留，而事件原因是她今年 9 月 8 日为反映征地问题而对前来视察的温家宝跪拜，梁永兰因恰好是站在最前的 4 名村民之一而被抓。据悉，村民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希望提高补偿款项，能按此前另一个房地产项目征收张镇长家时的每亩七万八补偿。第二希望规范施工——这次征地用来修建的洗煤厂已经开始施工，部分挖掘工作对村民的其它土地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新闻：http://fmn.cc/UFjsfh

http://fmn.cc/SVDRg5

11 月份，**北京**研究生郭大军母亲来京看望儿子被兰州警方带回并判劳教。兰州方面称赵梅福被劳教一事属实，但并非因其在北京的行为，而是继续执行此前的劳教处罚。11 月 21 日，兰州公安局新闻处又称，郭大军母亲“这次来北京也是非法上访，他们说没有(上访)是狡辩。”

新闻：http://fmn.cc/SVDQcb

本周其它重点新闻

天津大港区的湿地内发现数十只遭到人为投毒的东方白鹳，随后志愿者又发现了 60 具鸟类尸体，从而曝光了对野生迁徙候鸟的猎杀现象，据媒体报道，在候鸟迁徙的路线上，布满了各类猎杀行为，称这是一条“死亡之旅”。

新闻：http://fmn.cc/T5y08E

http://fmn.cc/WauLh2

据旅居美国加州的资深媒体人张伟国的博客消息，**中新社**的资深摄影记者邹宪，在 11 日被政法委系统秘密拘押，据悉同他写宗教方面报道有关。

新闻：http://fmn.cc/SQBI5N

13 日开始，有关**三一重工**涉嫌派遣卧底人员到竞争对手公司，窃取商业机密的网帖出现在各大论坛，16 日，中国媒体证实此案确实存在，而且正在审理当中，同时湖南省公安厅对此案也相当重视。

新闻：http://fmn.cc/SVD7YB

http://fmn.cc/ZVVeT6

本月**上海女排**在比赛中表现糟糕，事后被网友曝出因教练对队员性骚扰，据官方的通报，目前涉事教练被撤职并被调离女排。

新闻：http://fmn.cc/ZVUwFu

温州当地媒体 11 月 15 日报道温州永嘉县举行了一个揭碑仪式，被刻在石碑上的字，是习近平对当地一名官员的批示语。永嘉县的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少争议。

新闻：http://fmn.cc/TJ3lfT

11 月 17 日，**浙江**《今日早报》在头版刊登照片称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不过被网友揭发出这张照片为了摆拍而涉嫌新闻造假。当天晚些时候，《今日早报》承认摆拍，并发致歉声明，并“扣发图片中心值班编辑潘海松当月奖金，给予照片作者停权 6 个月的处理。”

新闻：http://fmn.cc/SVCZZ8

http://fmn.cc/SVCWMS

据宁德网的通报，11 月 17 日晚，**福安**市区发生警民冲突事件，起因是一场导致 5 人受伤的车祸，事故引发现场少数群众不满，对公安出警车辆进行打砸，三辆警车被掀翻。

新闻：http://fmn.cc/SVCSws

青岛一名女生和其他几名同学被学校老师带出学校吃饭，却在深夜从楼上坠下身亡，记者采访此事时却被学校告知“别没事找事”。消息引起人们的批评，据悉该校主要召集外出吃饭的老师已被开除。

新闻：http://fmn.cc/T5xK9P

http://fmn.cc/SVC230

一份有关中国农村教育的报告显示，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3 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 4 所**农村学校**。撤并学校导致辍学率大幅增加，并退回到 10 年前的水平。

新闻：http://fmn.cc/UPgyuD

11 月 20 日**海南临高县**一小学校在地震演练中，由于学校没有合理安排足够的疏导员，引起学生在二楼和一楼之间楼梯平台上下起哄推挤，造成在教学楼楼道上发生拥堵挤压，有 5 位学生当场缺氧昏倒在地，引起部分学生惊慌摔倒在地出现踩踏。目前仍有 12 名学生在医院留治，还有 2 名学生神志不清，病情不稳定。

新闻：http://fmn.cc/USE4kL

近日，调查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上发消息称，**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和情妇拍摄了不雅视频，之后还将其情妇抓起关押 1 个月。重庆市纪委回应称，正在了解核实情况。

新闻：http://fmn.cc/SVCjCR

http://fmn.cc/SVCgqT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宗洁、张博、柏蔚林

校订：丁昕

主编：方可成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冯自强

出品人：杜婷

